带着责任走基层

——“走转改”活动的思考

为什么要“走转改”？为什么首先选择新闻战线？活动初期，或许有人会这样问。

“离泥土越近，越有生命力”、“接地气才能长灵气”……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后，有些问题自然会有答案。但倘若仅在这个层面思考，还未能领会“走转改”活动的深刻内涵。

胡锦涛总书记强调，新闻舆论处在意识形态领域的前沿，对社会精神生活和人们思想意识有着重大影响。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信息传递和获取越来越快捷，新闻舆论的作用越来越突出。新闻媒体被视为我们党的重要执政资源，影响国家全局、关涉长治久安。“走转改”活动正是要通过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更好地发挥“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功能。

新闻工作者要以强烈的政治意识，带着责任走基层。只有认识到这种责任，新闻媒体才能在社会转型期，发挥统一思想、凝聚力量的作用；在矛盾凸显期，发挥解疑释惑、平衡心理的作用；在战略机遇期，发挥鼓舞人心、振奋精神的作用，使新闻媒体成为党联系群众的桥梁纽带，承担推进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庄严使命。

也只有带着这种责任，新闻工作者才能在“走转改”活动中，真正解决为大众还是为小众、走上层还是走基层、跑热门还是跑冷门的问题，从而了解改革发展的关节点、抓住人民群众的关注点、把握服务人民的着力点，把体现党的主张与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与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汇聚起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力量。

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以“一支笔”唤起工农千百万，成为夺取革命胜利的重要法宝；改革开放初期，正是新闻媒体展开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推动了改革开放大幕的开启；进入新世纪以来，新闻工作者以卓有成效的工作引领舆论，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营造了良好氛围；今天，在现代化建设的关键时期，新闻媒体依然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责任。从历史的视野中感受使命之大，在时代的挑战中体会责任之重，几十万新闻工作者必将在“走转改”活动中，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

——摘自《人民日报》

江苏省干部理论教育讲师团
江苏省政工专业资格评定办公室 主办

编辑出版:《大众学堂》编辑部
(内部资料、赠阅·总第 17 期)
电　　话:83392817
邮　　编:210013
联系地址:南京市北京西路70号
中共江苏省委宣传部五楼
电子邮箱:jsjst@yahoo.cn
承　　印:省地质测绘院印刷厂
准印证号:苏准印 JS-S001 号
出版日期:2011 年 10 月 8 日

主　　编　刘德海
副 主 编　宣云凤
　　徐东海
责任编辑　陈伟龄
　　夏正元
封面设计　许文菲

大众学堂

目　录 CONTENTS

卷首语

1　带着责任走基层

特别策划 * 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

4　为了谁　依靠谁　我是谁 …… 刘云山

9　从党报的光荣传统看记者走基层 …… 陈力丹

11　身不离基层　心不离群众 …… 京　平

12　多一些泥土气　少一些脂粉气 …… 华　羽

高端调研 * 贯彻群众路线

13　扎下深根才能攀得更高 …… 罗志军

前沿关注

19　从两次飞跃解读中国共产党的“创新密码”
…… 吴　兢

21　“七一”重要讲话公众最关注哪些提法

24　备受关注的新思想、新论断、新概括

中心组学习

27　省委召开全省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

市民讲坛

29　漫谈社会管理创新 …… 周毅之

基层经验

32　基层理论宣讲工作的体会 …… 中共淮安市委讲师团

DAZHONGXUETANG

33　以“学习力”提升“竞争力”

宣讲之星

36　大道理,也能讲得入耳贴心

38　“黄金谈”:思想圣火的辛勤传递者 …… 吕　昂等

政工之声

41　创新社会管理要重在社区 …… 张　舒

42　整合国企内部监督机制的设想 …… 余瑞国

学习园地

43　系统思考:科学发展观和学习型组织共同方法
…… 钟国兴

48　重读马克思 …… 聂锦芳

54　学习贵在“博”“通”“悟” …… 韩长赋

辛亥回眸

56　毛泽东对辛亥革命的评价 …… 卢　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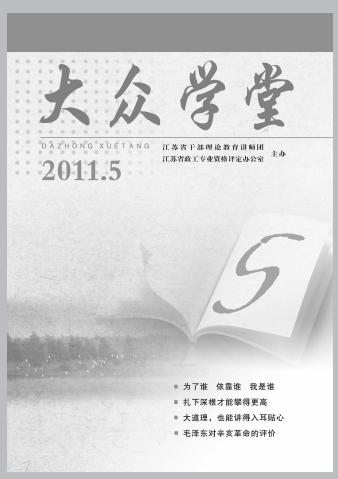
古事今谈

59　赵匡胤抓舞弊轶事 …… 宗承灏

环球视线

61　国外如何考核官员 …… 王　方等

63　新加坡怎样选用党政人才 …… 吕元礼



(2011 年第 5 期　总第 17 期)

为了谁 依靠谁 我是谁

——关于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几点思考

刘云山

胡锦涛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必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承担着宣传群众、动员群众、服务群众的庄严使命，本质上就是群众工作。要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观、人民是真正英雄的唯物史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执政观，在指导思想上进一步树立群众观点、强化群众立场，在工作内容上进一步反映群众愿望、满足群众需求，在思想作风上进一步增进群众感情、拉近同群众的距离，回答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的问题，使我们的工作获得最广泛最可靠最牢固的群众基础和力量源泉。

一、为了谁——一切为了群众、真心服务群众，引导动员群众为实现自己的利益而奋斗

任何一个政党都有自己的方向目标和价值追求，为谁立命、为谁谋利始终是一个根本性、方向性问题。我们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实现人民解放和幸福鲜明地写在自己的旗帜上，融入到全部的奋斗实践中。正是因为这样，我们党才赢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支持，凝聚起巨大的前进力量。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为党的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为了谁”的问题上，必然同党的性质、宗旨相一致、相适应。早在革命战争年代，毛泽东同志就明确提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强调我们要建设的文化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文艺要与群众相结合、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宣传教育工作就是要让群众知道自己的利益、自己的任务。这实际上都鲜明回答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为了谁”的问题。现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了深刻变化，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内容、形式、任务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无论怎么变，为人民服务这个方向不能变，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这个原则不能变。

解决好“为了谁”的问题，关键是站稳群众立场，坚持与群众站在一起，同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群众立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体现了对群众历史地位和作用的深刻认识，体现了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把握，体现了对保持党的先进性的坚定追求。只有真正领悟了群众立场的真谛，才会自觉自愿、发自内心地服务群众。宣传思想文化

工作站稳群众立场，就要始终牢记人民利益高于一切，以对群众高度负责的态度去宣传群众，以对群众的满腔热情去服务群众。

1. 宣传引导群众、动员激励群众。党对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前进方向，发动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为了群众，首要的是通过行之有效的宣传动员，引导群众知晓自身利益所在，并为之而奋斗。现在，我们党正领导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上致力于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致力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这是顺应人民群众愿望、符合人民群众利益的历史选择，也是实现民生幸福、让人民群众过上美好生活的伟大实践。要说群众利益，这是最大的利益；要说为了群众，引导人们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才是真正代表了人民根本利益。要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和工作大局，坚持不懈地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宣传科学发展的主题和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线，讲清楚党的方针政策同人民群众利益的内在联系，讲清楚经济社会发展同改善人民群众生活的密切关系，引导人们正确认识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要紧紧围绕我国发展的宏伟蓝图，紧密结合各地经济社会发展和干部群众生产生活实际，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为根本，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广泛深入开展形势政策宣传教育，激励广大群众投身改革建设实践，为创造美好未来而努力。

2. 反映人民群众心声、为人民群众谋利。党的宗旨决定着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替人民说话办事的价值取向，无论是宣传党的主张还是反映群众的意愿，最终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利益。必须面向基层、服务群众，关注群众需求，维护群众权益，说群众想说的话、办群众欢迎的事，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进一步解决好服务大众还是服务小众、服务多数人还是服务少数人的问题。要坚持把体现党的主张与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与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时刻牢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性质所在，把群众呼声作为第一信号，强化大众视野、百姓视角，直面问题、聚焦热点，更好地架起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要聚焦广大群众，为人民放歌抒情，多宣传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多表现平凡人物的精神世界，把更多的镜头版面对准普通百姓，充分展示群众“身边的感动”、大力唱响“劳动者之歌”。要敏锐感知群众冷暖，关注群众诉求，主动设置议题，加大对民生问题的宣传力度，加大对热点难点问题的阐释力度，反映群众心声、回应群众关切，让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更好地服务人民群众。

3. 满足群众精神需求、不断改善文化民生。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基本任务，就是提供健康向上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满足人们的精神文化需求，促进人的全面发展。随着物质生活的逐步改善，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更加迫切、更加旺盛。文化越来越成为改善民生不可或缺的内容，成为生活质量的一个显著标志。要着眼于满足人们多样化、多层次、多方面的文化需求，坚持眼睛向下、重心下移，推动文化产品、文化设施、文化服务向基层倾斜、向农村倾斜、向普通百姓倾斜，让文化改革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人民群众。对那些已被实践证明、深受群众欢迎的利民举措，如文化惠民工程，公共博物馆、纪念馆、文化馆、图书馆、美术馆免费开放，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等，要进一步加大力度，往深里做、往实里做。社会主义文化

是人民大众的文化，不是精英文化、贵族文化，必须全心全意而不是半心半意地服务人民大众，给谁看、给谁演、给谁读，在思想上必须十分清楚、十分明确。要树立以人民为中心、以普通大众为对象的创作导向，降低文化消费门槛，多生产群众买得起、用得上的文化产品，多提供普通群众喜欢的文化服务。要加强对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引导，把握好方向、把握好导向，把服务群众同引导群众结合起来，把满足需求与提高文明素养结合起来，更好地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

二、依靠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群众的伟大实践作为工作的动力源泉

成就伟大事业须有伟大力量。如果搞不清楚“依靠谁”，就找不到依靠的力量，再美好的社会理想也只能成为空想。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只有人民群众，才是历史的真正创造者，才是真正的英雄。我们党来自群众，始终以人民为靠山。回顾历史，每当党的事业面临重大挑战，每当中国的前途命运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关头，总是用人民群众的力量推动历史车轮前进。充分相信群众、紧紧依靠群众、紧密团结群众，这是党的事业成功的根本保证。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来说，无论是作为观念形态的思想理论、价值体系、道德规范，还是作为艺术形式的音乐舞蹈、书法绘画、诗词歌赋，无不源自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可以说，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根基在群众、智慧在群众、力量在群众。

解决好“依靠谁”的问题，关键是在思想上牢固确立人民群众的主体地位，在工作中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根本方法。人民群众既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也是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凡属正确的决策必然是将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再回到群众中去、使之成为群众的行动。面对层出不穷的新情况新问题，必须充分发挥群众的主体作用，激发群众创造，集中群众智慧，使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始终保持旺盛的生机活力。

1. 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充分调动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积极性创造性。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最大限度地激发人们的创造热情，我们的工作就能获得最广泛的支持，就有强大的生命力。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进步，全党全社会的文化自觉程度日益提高，广大群众对文化建设的热情空前高涨。能不能更加广泛地动员人民群众参与文化创造，已成为宣传思想文化事业成败的关键所在。要适应社会生活的新变化，进一步完善政策、拓展渠道、丰富载体，充分挖掘运用各方面的文化资源，畅通人们投身文化建设的途径，使群众真正成为文化繁荣发展的主角，使文化成为广大群众共建共享的文化。群众自己的创造、自己的演绎最鲜活、最生动，也最容易得到广泛的认同。要积极鼓励群众的创新创造，支持群众自我教育、自办文化，开展多层次、多形式的群众性文化活动。要大力营造良好社会氛围，千方百计保护好、发挥好群众参与文化建设的热情，进一步解放文化生产力，让全社会的文化创造活力竞相迸发、充分涌流。

2. 汲取群众智慧营养，从人民群众实践中获取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不竭动力。生活最深刻，群众最智慧。群众处在实践第一线，对事物的观察、对情况的了解更细致、更透彻、更深刻。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向前发展，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实践创造作为源头活水，从群众中汲取智慧，不断开阔工作视野、完善工作思路。谋划工作、制定规划、出台政策，都要尽可能地扩大听取群众意见建议的范围，都要发扬民主、集思广益，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闭门造车”、“唱独角

戏”,就难以作出科学决策,更难以在群众中得到落实。要深深植根于群众的实践土壤,深入到群众中获取“第一手材料”,从老百姓朴素的话语中提炼闪光的思想,从民间鲜活的艺术中萃取创造的元素,从基层的生动实践中探寻打开工作思路的钥匙,推动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推陈出新、有所突破。

3. 坚持由群众评判,把人民群众满意作为检验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第一标准。标准体现工作导向,反映价值取向。以什么为标准、用什么来衡量,实质上是一个对谁负责、让谁满意的问题。我们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政党,一切工作的成败得失必然要由人民群众来检验。群众意见是一把最好的尺子,最能衡量我们工作的长短优劣。无论是制定政策、出台规范,还是评选评比、考核表彰,都要注重群众评价,增加群众的话语权、评判权,不能关起门来搞自我评价、自我认可。坚持群众标准、由群众来评判,不能走过场,必须具有约束力,群众赞成什么就鼓励什么,群众期盼什么就做好什么,群众反对的就坚决纠正。要经常看一看我们的工作是不是按照群众的要求在展开,看一看有哪些措施和办法还需要改进,让群众真满意、而不是“被满意”,使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始终体现群众意愿,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的检验。

三、我是谁——视群众为亲人、把群众当主人,始终摆正同人民群众的关系

明确“为了谁”、搞清“依靠谁”,归根到底还是要解决好“我是谁”。这个问题对于每个党员干部来说非常重要。只有弄清“我是谁”,才能更好地认清自己、定位自己;只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把智慧的增长和本领的增强深深扎根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之中,坚持立身不忘做人之本、为政不移公仆之心、用权不谋一己之私,才能更好地改造自己、提升自己。

解决好“我是谁”的问题,关键是摆正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我们党与人民群众长期同甘共苦、患难与共,对党群关系有着极为深刻的认识,有许多形象生动的比喻:像舟和水、鱼和水,像公仆和主人、学生和老师等等,这些都强调的是群众的地位和作用,告诫我们要牢记自己的位置和身份。摆正同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宣传思想文化队伍建设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宣传思想文化干部素质的一个基本要求,也是改进思想作风、工作作风的一个重要着力点。要把实践当成最好的课堂、把群众当成最好的老师,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锻炼品质、净化心灵、改进作风,不断增强做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本领。

1. 群众是我们的根我们的本,必须情系群众、保持同群众的血肉联系。我们都来自人民,群众是我们成长进步的所依所靠。与群众心相连、情相系,保持同群众的血肉联系,是党的性质和宗旨的体现,是一种自然而然的要求。江泽民同志指出:“我们党有许多优势,根本的一条就是同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党执政之后,环境、条件大大改善,这为我们联系群众提供了便利,同时也容易在作风上发生变化。现在有的人把与群众的“鱼水关系”变成了“蛙水关系”,需要时跳进去,不需要时就跳出来。为什么交通发达了,通信先进了,有的人与群众的距离却远了、沟通却少了,说到底是对群众的感情淡漠了。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面对的是广大群众,做的是交流思想、沟通心灵的工作,尤其需要增进群众感情、树立大众情怀,走近群众、融入群众,同群众面对面、心贴心。只有深入群众,了解普通百姓的生活条件、生存状态,感受群众的喜怒哀乐、酸甜苦辣,才能对群众有真感情,才会自觉自愿地服务群众。要把深入基层、走进群众作为宣传思想

文化工作的一种理念、一种常态，多到基层一线，切身体验基层工作的实际，体会百姓生活的喜忧，把握群众的思想脉搏，在拉近同群众的距离中找准宣传教育的切入点结合点。要同群众交朋友，多交普通群众、困难群众，了解他们盼在何处、难在何处，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同群众融在一起、打成一片，真正成为群众的贴心人。

2. 群众是我们的衣食父母精神父母，必须感恩群众、以实际行动回报群众。感恩，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讲感恩，对于党员干部来说，最需要感恩人民群众。因为是人民群众养育了我们的党、成就了我们党的伟大事业，是人民群众给了我们干事创业的舞台、施展才华的天地。离开了人民群众，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付出，就没有了依托、没有了支撑，就会一无所有、一事无成。作为党的宣传干部，要把感恩群众作为政治要求、基本修养，常怀感恩之心，无论生活在何地、工作在什么岗位，为群众服务永远是我们的分内职责。只有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只有把群众当亲人，群众才会把我们当亲人。要保持赤诚之心、赤子之心，把群众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像对父母那样善待他们、像对亲人一样为他们服务。倡导什么、反映什么都要充分考虑广大群众的切身感受，创作什么、提供什么都要充分考虑群众的实际需要。群众期盼的、欢迎的，就要全力以赴做好，把感恩群众体现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基调导向的把握上、文化产品服务的安排上，把感恩之心转化为利民、惠民的实际行动。

3. 群众是事业成败的决定力量，必须敬畏群众、坚守共产党人的承诺。古人说，“天下之事，成于惧而败于忽”，“官有所畏，业有所成”。邓小平同志曾经讲过，共产党员谨小慎微不好，胆子太大也不好，要怕党、怕人民群众。古今中外，一些政权更迭、政党兴衰，也一再告诫我们，群众的力量最强大，对群众心怀敬畏，才能获得支持拥护、站得牢立得住，如果忽略了群众，就会被群众所抛弃。要经常用群众这面镜子照照自己，匡正自己的人生追求，校验自己的责任态度，衡量自己的职业精神，做到自重、自省、自警、自励。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提出新形势下我们党面临着“四大考验”、“四大危险”，是对全体党员干部的警示警醒，也是对宣传思想文化战线的警示警醒。宣传思想文化工作者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意识，坚守对人民群众的庄严承诺，时刻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对党和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做好本职工作。要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头脑，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决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坚定理想信念、加强党性锻炼、遵守党的纪律，在提高思想政治素养上下功夫，在增进对人民群众的感情上下功夫，在了解基本国情上下功夫，在务实干事上下功夫，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弘扬职业精神、恪守职业道德、树立良好形象，不负党的重托，不负人民厚望。

“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是新形势下贯彻群众路线需要深入研究回答的重大课题。弄清“为了谁”，才能找准前进的目标方向；弄清“依靠谁”，才能找到工作的力量源泉；弄清“我是谁”，才能把握自己的正确定位。要不断深化认识、深化实践，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各个方面，为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作出积极贡献。

（本文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刘云山同志2011年7月6日在全国文明办主任培训班上的讲话，发表时有删节。）

——摘自《求是》

从党报的光荣传统看记者走基层

陈力丹

我们现在的新闻传播业,起源于革命战争年代党的新闻事业。

新中国成立后,新闻事业较好地继承了以往群众办报、全党办报的光荣传统,报道了很多人民在生产、生活中的热点和难点,一些报道颇有感染力。

改革开放后的我国新闻传播业,在拨乱反正、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方针中,通过一系列焦点、热点的报道,有力推进了改革的进程。但在市场经济的环境中,新媒体传播的快速和便捷使得我们的一些新闻工作者变得懒惰了,滋长了机关化作风,而不是按照新闻工作的特点到一线去抓新闻;与采访对象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情景也不多见了,而这种情景在过去的中央媒体记者中,是常有的事情,新华社的穆青同志便是表率。市场经济环境下的传媒记者虽然经常在一线,但依赖 web2.0 各种便捷的信息渠道,有时并不是真正深入实际, 而是抄来抄去, 不到现场,不去核实,流于表面热闹,人民群众中发生的许多具有新闻价值的素材得不到挖掘。在这种情形下,中央提出"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的要求,是必要而及时的。

1996 年,江泽民同志视察人民日报时对记者提出了打好五个"根底"的要求,其中之一是打好"群众根底",胡锦涛同志 2002 年对记者提出了"三贴近"(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的要求,都是从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出发,对新闻工作者提出的有的放矢而又带根本性的要求。

在此不妨回顾一下历史。我们现在的新闻工作传统, 起源于 1942 年 4 月毛泽东领导的延安《解放日报》改版。在那之前的《解放日报》,总是国际新闻上头版,忘记了报纸面对的是九成文盲的陕甘宁边区群众。毛泽东同志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通过报纸指导工作、联系群众和反映群众等适合边区党群信息需求的要求。

《解放日报》第一个成功的典型报道,是《解放日报》记者莫艾(他亦是上世纪 70 年代《光明日报》主要负责人)写的劳动英雄吴满有的通讯。他在 1942 年 4 月 19 日延安县各区检查春耕的联席会上,听到柳林区区长尹登高提到吴满有的名字,说他"地种得多,荒开得多,粮打得多,缴公粮踊跃争先,数量既多,质量又好","我们这区上有个模范吴满有,公事就好办,他一个人的行动,比一百张嘴的解释还更有效"。新闻敏感性和对党的

政策的熟悉,使得莫艾迅速抓住这个线索,翻山越岭来到吴家枣园采访吴满有。随后,他的通讯《模范农村劳动英雄吴满有连年开荒收粮特多》刊登在1942年4月30日《解放日报》的头版头条。毛泽东看到报纸,肯定了这种深入实际的报道;朱德赞扬关于吴满有的长篇通讯,其社会价值不下于20万石救国公粮(这是1941年陕甘宁边区征收公粮的总数)。莫艾的报道中捕捉了这样一个镜头——吴满有感喟道:“穷人也有翻身的一天”。《解放日报》把这句话登在报上,刻画出吴满有翻身后的喜悦。莫艾的报道中还有这样的描写:“在政府号召切实展开春耕运动的时候,他在乡政府几乎兴奋得跳了起来。”后来的研究者写道:“这一‘跳’字,吴满有的兴奋之情跃然纸上。这一‘跳’字,足见《解放日报》记者的笔力。用‘跳’来展现人的兴奋之状,《解放日报》的记者莫艾是否是第一人,笔者无从考证。但‘跳’生命力顽强,至今仍屡屡出现在新闻报道之中,霍英东先生在中国女排获胜后便‘跳了起来’。”(刘明华、张征《新闻作品选读》)

纵览《解放日报》对吴满有的报道,没有一篇是文字晦涩的,甚至连诗歌也是如此。1943年3月9日,艾青的长诗《吴满有》在《解放日报》第四版整版刊出。艾青回顾说:“我把我写的《吴满有》拿出来念给他听——这是我找他的目的。我坐在他身边,慢慢地,一句一句,向着他的耳朵念下去,一边从他的表情来观察他接受的程度,以便随时记下来加以修改。”说来惭愧,我们现在的记者,还能做到如此尊重采访对象吗?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在改革开放的新环境中,《光明日报》记者樊云芳深入采访,其作品《一个工程师出走的反思》成为全国新闻界自发效仿的一种新的报道模式,刊出后在全国引起轰动,报社收到1600多封读者来信,报纸上辟出专版,进行了一个多月的讨论。她的作品回答了当时很多人对社会问题的困惑,她以事实本身所具有的哲理,启迪读者思索,而不是简单、生硬地表达自己的观点,从而达到记者和读者的双向交流,激起共鸣。

现在提出“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就是要继承和发扬以往的光荣传统。现在我们已经处于市场经济的新环境中,新闻记者应该牢牢记住,新闻工作是一种社会职业。马克思第一次当报纸主编第一天写的文章就说:“报纸的一般性质——经常的战斗准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20页)。胡锦涛2008年视察人民日报时要求我们“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办事”,2009年胡锦涛在世界媒体峰会上又提出:“遵守新闻从业基本准则”。显然,我们的“走基层”,不是一般意义的下去了解情况,而是要具备新闻敏感,迅速抓住有新闻价值的事实,及时加以报道;我们的“转作风”也不是一般的联系实际,而要认识到新闻现场才是新闻职业天然的工作场所;我们的“改文风”,也不是简单的不说套话空话,而是必须写出、说出人民真正关注的麻烦事、操心事、乐意事。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责任教授、博导)

——摘自《光明日报》

身不离基层　心不离群众

京　平

当前，新闻战线开展的“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正逐步走向高潮，记者下基层的身影多了，版面上来自基层的声音多了；记者贴近群众的距离近了，版面上真切感人的报道多了；记者践行的感悟深了，版面上打动人心、发人深思的作品多了。老百姓高兴了，直说“真没想到”，记者受到了锻炼，直说“真没想到”。

“真没想到”是因为一段时间以来，有些媒体忘却了、忽视了新闻的源头在基层、鲜活的新闻在广大群众生活实践中这一新闻工作者的本职。不出家门、不下基层、不到现场，就无法了解国情、社情和民情，就无法感受到社会的发展变化、人民群众的喜怒哀乐和各种诉求，就无法写出真实感人的报道，就无法向读者、听众传递真实的声音，记者和群众的关系疏远了、陌生了，报道虚假空洞，群众反映强烈。这样的记者有违记者的本分，有损记者的声誉。

做一名合格的记者就要追求“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铁肩是在基层实践中磨出来的，妙笔是从群众语言中练就的。如果没有历时 10 个月、行程 4000 余里的西部之行，范长江就不会写出中国新闻史上著名的通讯集《中国的西北角》；如果没有深入基层的扎实采访，就不会有通讯主角和作者同时齐名的《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这一传世佳作；如果没有对农村形势的深入调查，就不会有范敬宜的《莫把“开头”当“过头”》这一在历史关键时刻起到“定音”效果的名篇。

老一辈新闻工作者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新一代的年轻记者更应该奋起直追，走向基层、走向百姓。“不到现场见到那个人、看到他的生活、听到他说的话，写出的东西必定是干涩的”、“如果不到基层去，不走近百姓生活，冷暖不相知，新闻稿件无疑会缺乏真情实感、通篇冷硬文字”、“新闻工作者要有行万里路、访百家人的实践能力……如此写出的新闻报道才不会是无病呻吟，才能引起读者的共鸣”……这些年轻记者们走向基层的深切感悟，让我们看到了“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活动的初步效果，更对未来充满了信心。

曾经有人这样形容全国著名劳模申纪兰：手不离劳动，身不离西沟，心不离群众。仿造此语，我们的新闻工作者应该是：手不离笔，身不离基层，心不离群众。通讯再发达、网络再便利，都只是新闻记者工作的武器，而不是工作的内容和目标。范敬宜曾经说过，做一名合格优秀的新闻工作者，除了深入群众，没有其他捷径可走。无论新闻手段如何现代化，都代替不了对国情民情的了解，都离不了对社会实践的参与。迈开双腿走下去，放开身心沉下去，用心观察，用心思考，用心讲话，用心做文章，只要身心都深入下去了，每一位记者就会有所收获，有所成长。

——摘自《人民日报》

多一些泥土气　少一些脂粉气

华　羽

泥土气，是质朴、实在、贴近生活的风格；脂粉气，是矫艳、造作、脱离生活的风格，新闻工作者无论是作风还是文风，都应该追求多一些泥土气，少一些脂粉气。

曾经，我们的新闻队伍在新闻写作中出现了这样不和谐的音符：在网络上扒新闻，编故事，堆砌起来再主观地分析一通；或者满足于电话采访、邮箱约稿，让采访对象提供新闻通稿交差了事。“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决不能由此推导出“秀才不出门，报道天下事”。有的文章追求吸引眼球，追求新鲜刺激，不惜挖掘隐私，传播似是而非的小道消息，追风跟潮爱用这“体”那“体”；或者，也到了基层，但走马观花、蜻蜓点水、脚不沾泥，看的是先进单位，听的是你好我好大家好，采写出来的稿件千篇一律、“一片大好”，夸的是“形象工程”，做的是“表面文章”。凡此种种，都是“脂粉气”十足，特征是缺乏诚意，粉饰成绩，没有实料，对基层、对百姓缺少感情。

曾经，有这样一段顺口溜：一等记者炒股票，二等记者拉广告，三等记者会上泡，四等记者傻写稿。这固然是调侃，但也可以看出，以往我们的新闻队伍中的确存在一些不良现象，如：态度不端正，不愿把真心放在“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崇高事业中，不屑把眼光放在真正可以服务人民、成就事业的基层。这样的现象是有害的、危险的。

要让新闻报道有人看、受欢迎，新闻战线的同志就要怀着对党对人民高度负责的精神，深入基层。不仅“身”入基层，更要“心”入基层，真正走进群众，和群众交心、向群众学习。转变作风，改进文风，用群众的视角去观察问题、用群众的语言去描述生活，让清新文风扑面来，让自己身上多一些泥土的味道，让自己的笔下多一些泥土的芬芳。

多些“泥土气”，就是要真正心系人民。走进基层，在和老百姓的真心相处中，增进感情，建立起深厚的情谊，才能实实在在地为人民办事情。用手中的笔书写老百姓的真实生存状态，反映老百姓的困惑和需求，替老百姓发出声音，与人民群众一道共同破解难题、凝聚力量，用群众喜爱的形式架起沟通的桥梁。也唯有如此，才会真正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接纳。

多些“泥土气”，就是要脚踏实地，坦率真诚。不走形式不做样子，把深入基层作为自己的工作常态和永远的职业追求。要有直面现实的勇气，走进老百姓家中、走到田间地头、站到工作第一线去了解民情、了解社情，多走多看多思考。走进百姓的生活看中国，从一个个普通人的故事去思考整个社会的问题，这样的新闻不仅鲜活可感，也更有力度更有价值。

多些“泥土气”，就是要有吃苦精神和恒心耐心。深入基层，一定要力戒急功近利，要明白我们不是来混资历混形象的，我们是真正来做事的。基层的条件艰苦，更能锤炼耐性，更能祛除我们身上存在的潜伏的脂粉气，让我们经受住环境的考验，在克难奋进中增长服务人民的才干。

——摘自《光明日报》

扎下深根才能攀得更高

——在沈高村驻点调研的体会与思考

罗志军

从沈高村回来，我对在全省推动领导干部下基层开展“三解三促”活动的信心更加坚定。结合实际，省委对这项活动作了进一步部署，特别是对“什么人下去”、“下到什么地方去”、“怎么下去”、“下去干什么”这四个问题进行了规范，明确不但要有形式更要有内容，要求各级领导干部结合分管工作和部门职能，深入到村镇、社区和基层单位去，重点到那些比较困难、经济薄弱和矛盾比较突出的地方去，扎扎实实地开展好“三解三促”，同时推动这项活动常态化制度化，建立考评机制，着力形成领导干部深入基层、深入群众的长效机制，促进各级干部真正把群众放在心坎上、当人民的好公仆，努力做到科学发展向上攀登、联系群众向下扎根，使江苏不仅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力争走在全国前列，而且在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上也力争走在全国前列。

今年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开局之年的江苏工作贯穿了一条红线，就是按照胡锦涛总书记对我们提出的最新要求，全面落实“六个注重”，全力实施“八项工程”，又好又快推进“两个率先”，努力在新的起点上开创科学发展新局面。在进行工作部署、展开工作布局的过程中，我们感到，有了明确的目标任务和思路举措，关键还要各级干部团结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去共同奋斗。这就对我们改进领导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做好群众工作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为此，省委、省政府决定在全省开展领导干部下基层“三解三促”活动（了解民情民意、破解发展难题、化

解社会矛盾,促进干群关系融洽、促进基层发展稳定、促进机关作风转变),在原来规定每年下基层调研时间不少于两个月的基础上,明确要求其中安排5至7天时间,到村镇、社区和基层单位进行驻点调研,住下来,扎下去,与基层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为了推动这项活动在面上开展,我和学勇省长带了个头,6月中旬分别到泰州市和徐州市进行了驻村住户的调研。

我所去的沈高村,地处姜堰革命老区,因纪念两位革命烈士而得名,由三个村合并而成。全村耕地面积3600多亩,总人口3100多人,去年村集体经济收入不到10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约7000元,对照我省的有关标准,是一个典型的经济薄弱村。

从6月15日至19日,我在沈高村一共待了5天4夜,住农民家、吃农家饭、干农村活,先后走访了20多家农户,看望了村里的一些老党员,开了六个座谈会,与部分种养大户、个体私营企业主进行了交流,考察了农业生产和村中心小学、幼儿园、卫生所、敬老院等公共服务设施,参加了农业生产劳动,还到镇信访室接待了信访群众。五天时间虽然短暂,但许多场景常常在脑海里浮现。回头想想,这次驻点调研可以概括为"四个一":当了一回村民,走了一圈亲戚,解剖了一个村子,结下了一段不解之缘。最突出的感受是:来到群众中,感到特别踏实;和百姓在一起,过得特别充实;与人民同甘苦,心情特别舒畅;领导干部应该下去,能够下去,下去以后大有益处。

密切党群干群关系关键在干部,我们把群众当亲人,群众就会把我们当亲人

头一天进村的时候,我坚决没让当地领导陪同,从省委大院直接到了沈高村的村部,然后由村支书领到了此后几天住的农户家。这次市县的同志也给予了很大支持,在我驻点期间,他们始终没有在村子里出现。这样做,看似一种"颠覆",其实不过是一种"回归"。很快,群众就用他们的语言,对我的进村之举作了评价。曾担任过村支书的刁友金老人在我去看望他时笑谈了一番,他告诉我,我这个省委书记来村子里的消息一下就传开了,有人私下里议论说,省委书记可是大干部,大干部应该有大架子,怎么就两三个人,也没什么动静,不像个大干部。这番带着些许调侃的话语,反映了群众对那种领导干部下基层前呼后拥的情形是看在眼里、不屑于心的,也道出了他们反感什么样的干部做派,欢迎什么样的干部作风。"不像个大干部",这句话在我听来既很欣慰,又有不安。反思平时我们领导干部下基层调研,每到一地层层陪同,再加新闻记者,领导干部被包围着、裹挟着,老百姓只是远远地看个热闹,人虽然到了基层,但并没有真正走进群众、融入群众,就像"葫芦掉到井里,看似沉下去了,其实还浮在水上"。这次我是下了决心,要破一破那些个"惯例"。

我的"房东"刁友生是位老党员,儿子在西安打工,女儿出嫁另住,平时就老俩口在家,一年种田、打工的收入一万五千元左右,生活水平在村子里属中等。四间正屋两间厢房的农家小院,坐落在穿过村子的一条小河边,房子虽然旧了点,但收拾得很整洁。5天朝夕相处的生活,我把自己当作这个家里的一个成员,尽量按照他们的节奏起居。一早起来常常是在院子里和老刁坐在条凳上聊聊天,有时也到厨房去帮帮厨。屋子里有苍蝇就用起了苍蝇拍,夜里有蚊子就挂起了蚊帐。当他们感到你没有丝毫嫌弃、真把自己摆进来的时候,就会把你当亲人一样来关心,生怕你吃不好、睡不好,从心底里格外护着你。那天去干农活前,老刁的老伴就劝阻了我半天,说那些农活不用我去干,他们手

头紧一紧就带过去了。还有一件事我后来知道了也很感慨，言语不多甚至有些木讷的老刁心却很细，每天夜里还都起来在家前屋后巡查一番。没两天，他们对我就由一开始的礼貌拘谨变得亲切热络。记得头一天到老刁家时，老俩口因为紧张忙乱，做饭时竟忘了摁电饭煲的开关，我们中午吃的米饭是从邻居家借来的。后来他们经常把孙子、外孙叫过来跟我一起吃饭，小家伙们吃完饭就在这边写作业，还拿起练习簿让我给他们写留言。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重要讲话中讲到要“在同群众朝夕相处中增进对群众的思想感情”，对其中的深意我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俗话说，亲戚是走出来的，感情是处出来的。驻点调研期间，我尽可能多地走家串户，登门了解情况、听取意见，跟大家一起拉家常。走访也没有什么特定的对象，常常是晚饭后打着手电（村里还没有装路灯），信步而走，哪家门敞着、灯亮着，就拐进哪家。也就是在这样一种不经意、很自然的状态中，没有了身份的界线，听到了许多平时听不到的话。距离拉近了，就很容易产生情感上的交流、心灵上的共鸣。有一次与一个村民聊到现在村干部精简变少的话题，我说这样“群众的负担就轻些”，那个村民脱口而出说“干部的负担就重了”。像这样一种换位的碰撞和相互的体恤，我想只会发生在干部与群众零距离接触的时候。临行前一天晚上，我从老刁夫妇的口中得知，第二天一早乡亲们要自发来送行，有的还准备了刚刚收获的农产品。为了不给村民们增加麻烦，我赶紧让村干部连夜登门一一说服劝阻，并且第二天早晨作了提前离村的决定。虽然没让乡亲们送成行，但他们的那份心意我领受了。不几天，村民们给我写来一封信，用朴素的语言表达了他们真挚的感情。而我则对苏中平原上的那个村庄及其乡亲们，多了一份牵挂和惦记。

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充满深厚感情，我们要把老百姓的期盼作为做好工作的鞭策

无论是走访座谈时，还是日常接触中，基层群众说得最多的是“党的政策好”、“感谢共产党”，对省委决策部署、对当地党委政府的工作总体上也是满意的。群众有一些意见，主要是事关他们切身利益的具体问题还没有解决好，比如看病贵、农资价格上涨、农田水利建设滞后等。每当我握着一双双粗砺的手，看着一张张饱经风霜的脸，确实很受触动、很受教育。应该说沈高村多数村民的生活还不算富裕，村里的青壮年大都外出打工或进城了，留守老人和儿童居多。有的老人六七十岁了，身体不太好，还要插秧、干农活，很辛苦。而在我省苏南等地，这样的情况基本上没有了，老人至多在家里收拾收拾，照看照看孩子，“田”名义上都还有，但大都集中到大户经营了。而沈高村的老人多数还要不停地劳作，生活上也是能省一点是一点，但他们勤劳而坚韧，不怨天尤人。整个村子民风淳朴很和谐，老百姓都发自内心地拥护党和政府。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丁克勤老俩口，不久前老丁患了中风，当时能在别人搀扶下拄着拐杖走几步，说话还不利索，和老伴住在两间简陋矮小的平房里。我一再问他们家里有什么困难和要求？老俩口也以强调的口气回我说真的没有什么困难。出了屋子，村支书告诉我，老俩口治病花掉了近两万元，还不知哪一天能报销、报销多少，为了节省医药费，老丁提前一周就出了院，至今还没复查。我听了心里感慨万千，这就是咱们的老百姓，多么的善良、朴实和隐忍。我们常讲，人民群众是衣食父母。当他们的生活仍然艰辛的时候，我们又有什么理由养尊处优？当他们对一些关切的问题提出诉求的时候，我们

又有什么理由不竭尽全力去帮助解决？更何况很多问题本身就是工作不到位、政策不落实造成的。比如，农村新型合作医疗报销的问题，有关政策要求是十分明确而具体的，但我在一些医疗点上确实也发现许多要求没有落实，难怪群众反映报销标准不清楚，报销手续太繁琐。后来省卫生厅的同志到姜堰作了现场指导和督促后，这个问题很快就得到了解决，办法就是由医疗机构先行垫付群众报销的医药费用，再由合作医疗管理机构与医疗机构结算，减少审核环节，做到即时结报，同时采取上墙公示、编印手册等多种方法，接受群众监督。我想，对诸如此类的问题，要建立起一种有效的落实和督查机制，不能等群众意见大了再来解决，而要把工作做在前面、做得更主动。

与村里的老一辈人不同，沈高村的年轻人因为外出打工或在外工作，见识广了，眼光也高了。我碰到几个刚好回家的年轻人，他们就跟我说起外面一些地方发展得如何如何，而他们村子还只是个什么状况。这就跟以前一家子都窝在一个村里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有了比较，群众致富奔小康的意识就更强烈，对富裕、和谐、文明的期盼也更强烈。各级干部应该以此为鞭策，把一个地方发展好，让一方百姓生活好。我们所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人民谋幸福，这不是抽象的，在沈高村的几天，我对“保障和改善民生”、“以人为本、执政为民”这些平时常说的话有了更直接更具体的体会。柴米油盐茶，上学、看病、养老，这些都是关乎千家万户的民生大事，需要一件一件地做好做实。让所有的老人老有所养、安享晚年；让所有的年轻人就业有机会、创业有舞台；让所有的孩子受到良好的教育、健康快乐成长，这应该成为我们践行宗旨所追求的目标。

群众工作重在平时，尤其是群众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要多做“雪中送炭”的事

在沈高村，我也接触到一些生活条件比较好的家庭。有天晚上走访的一户人家，院子里停着小轿车，客厅里摆放着双开门大冰箱，平时也是老俩口过，儿子在上海工作，有着不菲的收入。但是在交谈的过程中，发现女主人喜欢提意见，心里有怨气，联系此前走访其他村民的情形，我最初的感觉这可能是一种“穷而知足，富而不满”的现象。后来，从女主人一再强调他们家境遇的改变是因为儿子有出息、没有靠别人的话语中，我感到并不能下先前的结论。事后我又进一步了解到，这一家原来确实条件很差、非常困难，当年儿子考上大学，到处求人借钱，很无助，也很憋屈。现在钱虽然早已还清，但心里的阴影还没有散尽。由此我想，如果在这户人家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我们能扶他一下、拉他一把，可能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他们心里就会多一分感恩，对社会也会多一分认同。知民情、解民忧

才能暖民心，我们做群众工作功夫应该更多地下在平时，特别是广大基层干部天天和老百姓在一起，要及时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所盼，多做雪中送炭的事，把工作做在群众急需处，做到群众心坎上，真正成为党和政府联系人民群众的纽带。

正如曾担任过村委会主任的一位老同志所说，过去村干部是“指挥型”的，现在变成“服务型”的了，以前村里的会计说一句话都很管用，现在要看你是不是把实际问题解决了，有没有把大家服务好。在沈高村我了解到，今年遭遇的大旱给农业生产带来了很大影响，村干部起早贪黑调水抗旱，出了很大力、吃了很多苦。村民们对此也是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的。虽然因为客观条件的限制，并不是每一家的调水要求都得到完全满足，但群众能够体谅。不少村民跟我说起这事，都讲“天太旱，不能怪村干部”。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只要我们真心诚意地为群众办事，特别是在群众遇到困难的时候能够帮其所急、解其所忧，就会赢得群众的信任，群众才真正愿意跟着我们一起干。

驻点调研期间，我专门到沈高镇信访室接待了一些信访群众。作这样的安排，我想一来可以推动一些实际问题的解决、化解一些社会矛盾，二来也是做面对面、心贴心的群众工作，三来可以从中了解群众反映集中的问题，为面上制定政策提供依据。那天来访群众反映的问题大大小小，各不相同。如专业合作社缺少发展资金、现行土地承包政策“增人不增田、减人不减田”带来的矛盾、某省道的路基较高存在安全隐患，等等。也不是所有问题马上就能得到解决，有些要与省有关部门商量，有些还涉及到政策的调整。直接面对群众的诉求时，我感到虽然许多事情是具体的、琐碎的，但对每一个个体来说都是大事、都很重要，因此，能够解决的现场就提出了解决方案，一时不能解决的耐心细致地给予解释。整个接访过程中，大家都心平气和，群众很通情达理，气氛一直十分融洽。我再一次亲身感受到，群众是讲实际的也是讲感情的，只要我们带着深厚感情走到群众中去做工作，很多事情就能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很多矛盾就会得到缓和与化解。

领导干部下基层不是简单的扶贫济困，更重要的要使我们作决策办事情更加符合实际顺应民意

江苏作为东部沿海省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总体较高，但是仍然存在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省直机关对口帮扶贫困村也有十多年的历史。我们曾作过一项调查，2007 年全省年人均纯收入 2500 元以下的贫困人口有 468 万，这几年通过实施脱贫攻坚工程，加大对经济薄弱村和困难户的帮扶力度，到去年底已有 362 万人脱贫，今年底可以全部脱贫。虽然我们初步解决了贫困问题，但城乡、区域发展差距还比较大。我省经济最发达的苏州市去年人均 GDP 达到 9 万多元，而苏北的宿迁市只有 2 万多元。同时在新的发展阶段，我们也面临着不少需要认真分析解决的新矛盾新问题。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可能经济上去了，社会反而不安定了，甚至会影响政权的巩固。所以，在江苏开展领导干部下基层活动，既要积极帮助基层和群众解决遇到的困难和问题，又不是简单的扶贫济困，更重要的是通过掌握第一手情况，使我们作决策、办事情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更加切合实际，更加符合老百姓的期盼。我觉得在考虑一个区域的发展时，尤其要关注两个问题：一是树立什么样的标杆？二是最困难的地方应该怎么办？江苏的苏南地区经济发达，是全省的排头兵，我们要求这些地区瞄准国际先进水平，不断提升发展层次，为全省树立进取的标杆。而苏北一些地区基础还

比较薄弱，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还不高，我们作决策定政策的时候，需要更多地关注和照顾到这些地区的实际，这样，决策的立足点才更牢靠。

我这次驻点调研，主要采取的是“两先两再”的方法，就是先扎下去了解实情、再提起来梳理问题，先聚焦于点上获得更多的感性认识、再扩展到面上寻求一般的规律。我在沈高村进行了广泛的走访和座谈，力求能够更多地看一看、更多地听一听、更多地聊一聊。在此基础上，我和村干部们一起对村子的发展进行了研究和讨论。先是排了排村里急需要办的具体事情，商定了建四个抽水泵房、整治河道、安装路灯等几件事。接着对村子发展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找到了沈高村集体经济薄弱的最大症结，就是工业企业少、规模小，进而梳理了发展思路，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措施。在驻点调研结束前，我又召开了由泰州的市县领导、部分乡镇党委书记以及30多位村（社区）干部参加的座谈会，结合这次驻点调研了解到的情况，将讨论和研究扩展到如何推进农业现代化、创新农村社会管理、加强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建设等面上的问题。回机关后，我再次召开有关部门同志参加的工作会议，提出基层的问题解决答案在机关，要求拿出面上的举措，进一步抓好省委、省政府各项政策在基层的落实。我发现有了在基层的直观感受和感性认识，对许多问题的理解就不仅仅停留在表面。像农业现代化怎么干的问题，现在许多村和沈高村一样，年轻人多数外出打工，留在村里的都是老人孩子，缺少劳动力，在这种情况下土地怎么流转，怎么向种植大户和合作社集中，这不是简单喊几句口号、说明几个概念就可以解决的，都需要在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拿出真正管用的办法。

实践是最大的课堂，群众是最好的老师。只有经常深入实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才能真正解决好为什么作决策，如何作决策的问题，才能知道决策是否正确，有没有落实，效果好不好。如果干部的根子没有扎在基层，没有想老百姓所想，决策就有可能产生偏差，工作的目标和结果也可能产生偏差。这次驻点调研，我了解到基层群众对我们的工作总体是很认可的，特别是省委关于落实“六个注重”、实施“八项工程”、又好又快推进“两个率先”的新部署，在基层已经形成广泛共识，正在转化为自觉行动，这让我感到非常欣慰。

（作者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摘自《光明日报》

锐词

食奴

指的是那些受信息影响，吃饭太算计，太痛苦，这个不敢吃，那个不敢吃的人。

炫捐

指的是高调炫耀自己的慈善和捐款行为，而不考虑受助人所承受的尊严压力。

直升机父母

对孩子无所不管、无处不在，当孩子有需要时立即给予补给，在孩子遇到困难时随时“降落”为孩子挪去障碍……这就是“直升机父母”。

金融清洁工

美国欠了全球大部分国家的债，其中中国、日本、巴西为主要的债权国，充当了一种美国不良金融的清洁作用，被形象地称为“金融清洁工”。

从两次飞跃解读
中国共产党的“创新密码”

吴　兢

在中国共产党90年的奋斗史上，能称得上“历史性飞跃”的重大理论创新，有两次——

第一次飞跃，发生在革命时期的中国。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回答了“进行什么样的革命、怎样进行革命”这一根本问题，形成了毛泽东思想这一伟大的理论成果，指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建立了新中国并迈入社会主义。

第二次飞跃，发生在改革时期的中国。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人民创造性地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根本问题，形成了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向前推进。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次飞跃如何实现？有何“创新密码”？“七一”前夕，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续添和中央党校教授张荣臣。

从何而来——
先进政党　政治智慧

中国共产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先进政党，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先进政党。90年来，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坚持解放思想、求真务实、与时俱进，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两大理论成果，引领中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前所未有的道路。两大理论成果的形成发展，有何深刻的社会背景和因由？

王续添：两次飞跃和两大成果，充分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智慧，也集中体现和代表了近百年来中华民族的政治智慧，至少可以从四个方面予以分析：

其一，一定历史时代民族、国家、社会和

大众最大最高和总的需求，以及如何满足这种需求，可谓政党理论创新最基本的背景和条件。

其二，进一步来说，民族、国家、社会和大众出现危机，甚至是生存的危机，以及如何化解危机，也是一个政党理论创新过程的关键节点。从危机走向新的生机的过程，往往就是产生和展现高超政治智慧的过程。

其三，正反两方面的实践探索和经验总结。从一定意义上讲，反面的实践也具有“试错”意义。而如何处理和总结过去，尤其是善处过去，从一定意义上说，更是理论创新不可或缺的过程和条件。90 年中，中国共产党先后形成了 1945 年和 1981 年的两个关于历史问题的决议。妥善地处理了历史问题，总结了历史经验，对两大理论成果的形成发展具有特别的价值。

其四，从两大理论创新的主体上看，也是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属性和特征使然。作为阶级性和人民性统一、精英性和大众性结合的使命型政党，对来自社会和民众的呼声和要求，反应一向具有高敏感度。这恰恰是其理论创新的一个主要动力机制。

如何而生——
把握国情　顺应时代

纵观两次飞跃，那些经过时光检验的论断振聋发聩：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我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马克思主义，怎样才能深深扎根中国的土壤？

张荣臣：这两次历史性飞跃，都是中国共产党人紧密结合我国国情，准确把握时代特征，在实践基础上不断创新的结果。民主革命时期最重要最紧迫的，是解决“站起来”的问题，让中国人民翻身得解放，实现民族独立；新中国成立后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最主要最关键的，是解决“富起来”的问题，让中国人民共同富裕、走向小康，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不同阶段不同国情，不同国情不同问题，不同问题不同需求，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要在解决不同时期中国问题的过程中生产独创性的实践经验，创造出新的有质的飞跃的理论体系。

王续添：这两次理论创新有着鲜明的中国特色：理论和实践紧密互动，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理论和大众的紧密互动，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连接历史、现在和未来，以现在为基础，融汇历史，面向未来；民族的表达形式，汲取了中国传统政治文化的元素，凸显了中国文化的特点等。

往何而去——
迎接挑战　放眼未来

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是社会发展和变革的先导。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必将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如何大力推进实践基础上的理论创新？

张荣臣：世界上没有哪个政党像中国共产党这么强调理论创新。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无论是革命、建设、改革，包括执政，每走一步都是新的东西，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以借鉴。苏联共产党当年闹革命，搞的是城市武装暴动，这条路中国走不通，只能以农村包围城市。这就是创新。我们党已经实现了两个根本性转变：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这些既集中反（下转第 23 页）

“七一”重要讲话 公众最关注哪些提法

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举世瞩目,反响热烈,许多精彩话语受到各界好评,并被广为传诵。那么,公众对“七一”讲话哪些内容最关注?对哪些方面最满意?为此,人民论坛杂志问卷调查中心随机做了3218个问卷样本,得出基本结果如下:

受访者最关注的10个提法

“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排第1位)

这“四个危险”的概括体现了当前党的领导集体深深的忧患意识。受访党员干部表示,这说明我们党更加重视自身建设,把党的自身建设问题摆在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受访者最关注“四个危险”,说明公众如同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说的那样 “常怀忧党之心、恪尽兴党之责”。

“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排第2位)

这是在网络被引用最多的一句话。很多受访者向人民论坛记者表示,胡锦涛总书记的这句话让人深受感动和鼓舞:“这句话不但使人感到耳目一新,而且温暖人心,决非空洞的政治口号。”

“坚定不移把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排第3位)

很多受访者对人民论坛记者表示:这句

话听来大快人心,体现了党和国家对惩治腐败的信心和决心。从此次讲话中,我们感受到党对长期执政的条件下滋生腐败的严重性和危险性,认识是非常清醒的;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坚持反对腐败,态度也是非常坚决的。

“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排第4位)

不少受访者表示,用什么样的人,关乎党和人民事业的兴衰成败。只有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党和人民的事业才能够薪火相传、兴旺发达。

“党对青年寄予厚望,人民对青年寄予厚望”(排第5位)

在人民论坛记者的调查采访中,很多受访者尤其是青年学生对这句话感触最深,“这是对我们青年的殷殷期待,发人深省,激人奋进”。党的事业,需要青年的参与;青年需要投入到党的事业中体现人生价值。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排第6位)

不少受访者表示,这句话承载着历史、现实与未来,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发展的重要性。这句话也是对现实的警示。面对“四大考验”、“四大危险”,中国共产党更应该坚持从严治党,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切实解决中国发展中遇到的问题,才能真正“办好中国的事情”。

“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排第7位)

“发展是硬道理”已成共识,这是被改革开放以来伟大实践证明了的结论。30多年来我国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国际地位大幅提升的根本原因,就是牢牢坚持发展是硬道理的战略思想。此次讲话首次明确提出“稳定是硬任务”,要求我们在实践“发展是硬道理”的同时,着眼于“为之于未有,治之于未乱”,做到未雨绸缪。有受访者对人民论坛记者说:“发展与稳定是我们推进现代化建设的车之双轮、鸟之两翼,任何时候都不能或缺。”

“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排第8位)

90年来,我们党无论在实践上还是理论上都取得了丰硕成果。很多受访专家表示:“胡锦涛总书记的这句话为我们坚持党的思想路线,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指明了方向。我们理论工作者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直面新的实际和新的实践,进行求真务实的理论探索,作出新的理论概括,永葆科学理论的旺盛生命力。”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国家发展的战略资源”(排第9位)

这句话充分体现出党对人才问题的高度重视,是新形势下对人才强国战略的重要要求。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历史表明,无论是经济社会建设还是干部队伍建设,唯有构筑起人才优势,才能引领各项事业走上又好又快的发展道路。受访者纷纷表示,中国的发展为每个人的成长成才提供了更宽广的舞台。

“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排第10位)

有受访者表示,胡锦涛总书记在讲话中首次提出的“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具有极其重大的现实意义。9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探索道路,将实践上升为理论,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而“制度”恰恰是在“道路”和“理论体系”这二者基础上的固化。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李忠杰说:“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和稳定性。固化到制度上,我们各方面的成果就能长久地存在,并发挥作用。”

受访者最满意的5个方面

实事求是,不居功自傲,也不回避现实

问题(排第 1 位)

超过五成受访者高度赞扬“七一”讲话中对历史成就的概括和现存问题的剖析。有受访者对人民论坛记者表示:“胡锦涛总书记在短短万余字的讲话中,既精炼总结了我党取得的伟大成就,也没有因为取得了伟大成就,就忽略我们现在存在的问题。这种实事求是、直面问题的精神,值得我们学习。有了这样的精神,遇到什么问题都不怕。”

思想深刻,有很强的理论性、战略性与指导性(排第 2 位)

很多受访者在评价此次“七一”讲话时,都不约而同地用了这样的词:“内涵丰富,思想深刻。”作为重要时间节点的纪念性讲话,此次“七一”讲话回顾中国发展进步历程,展望中国发展繁荣的前景,在很多受访者眼中,既是理论总结,也是行动纲领,有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和重要的战略意义。

关注民生,关心群众,体现务实作风(排第 3 位)

在这篇纲领性文献中,胡锦涛总书记也回应了当前民生热点。在“保障和改善民生”的 300 余字论述中,梳理了当下及未来民生的数个关键词:就业、教育、社会保障、医药卫生、保障性住房、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加大收入分配调节力度等,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因此受到百姓高度关注。

文风质朴,情真意切,语重心长,让人深受感动(排第 4 位)

很多受访者对人民论坛记者表示:“此次‘七一’讲话的文风很好,在平实中有新论,在质朴中抒情怀,非常实在。”特别是近日广为流传的“名言警句”,如“只有我们把群众放在心上,群众才会把我们放在心上”、“拜人民为师”等,都体现了这一点。此外,“七一”讲话饱含深情,语重心长,如对党政干部的告诫、对青年的寄语等,十分温暖人心。

有新总结、新提法、新思想,让人耳目一新(排第 5 位)

许多受访者对人民论坛记者表示,此次“七一”讲话的一大亮点是“新”。讲话提出了一系列新思想、新观点、新论述、新论断。有的观点是第一次提出;有的论述是对以前论述的深化和完善;有的论断是对以往论断的提升和发展;有的则是用群众通俗易懂的语言文字进行了新的表述。受访者们向人民论坛记者表示,讲话中的新意,让人看到了党和国家与时俱进的不竭动力,也让人体会到求真务实的魅力。

——摘自《人民论坛》

(上接第 20 页)映了党取得的巨大成就,也对执政党建设提出了许多崭新课题。中国共产党应对这些挑战,要立足当前、注重长远、放眼未来,不断创新。

王续添:客观上,到本世纪中叶未来的几十年,是中国全面实现现代化的关键岁月。中华民族复兴的重任,民众对未来的期待,风云变幻的国际局势等,摆在作为中国社会中心和领导力量的中国共产党面前还有许多挑战和难题。迎接这些挑战,解决这些难题,就决定了这一理论体系会有新的发展和增量。

主观上,中国共产党的自觉和自省以及创新意识,也是这个理论体系未来发展关键变量。只要能承继前人留下来的宝贵财富,关注现实,关注民生,放眼未来,放眼世界,善于学习和总结,力戒空疏和自满,就会使其有新的甚至更大的发展。

90 年党史,既是一部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为民族复兴而不懈努力的“奋斗史”,也是一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创新史”。实践永无止境,创新永无止境。

——摘自《人民日报》

备受关注的新思想、新论断、新概括

“三件大事”——“90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人民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集中体现为完成和推进了三件大事。”“第一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实现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第二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完成了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第三件大事，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进行了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开创、坚持、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四个选择”——“事实充分证明，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进步的壮阔进程中，历史和人民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选择了改革开放。”

“三大成就”——“经过90年的奋斗、创造、积累，党和人民必须倍加珍惜、长期坚持、不断发展的成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确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两大理论成果”——“一大理论成果是毛泽东思想。”“另一大理论成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五个有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有利于保持党和国家活力、调动广大人民群众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推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有利于维护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有效应对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风险挑战，有利于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统一。”

“一面旗帜”、“一条道路”、“一个体系”、“一个制度”——“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继续前进，开创工作新局面，赢得事业新胜利，最根本的就是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和丰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一个基本结论”——“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四个始终保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以科学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指导新的实践,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定不移走自己的路,始终保持党开拓前进的精神动力;坚持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从人民群众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坚持任人唯贤、广纳人才,以事业感召、培养、造就人才,不断增加新鲜血液,始终保持党的蓬勃活力;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正视并及时解决党内存在的突出问题,始终保持党的肌体健康。”(以上“四个始终保持”也概括为“四个根本点”或“四个坚持”)

“四大考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

“四大危险”——“精神懈怠的危险、能力不足的危险、脱离群众的危险、消极腐败的危险,更加尖锐地摆在全党面前。”

“五个必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提高全党思想政治水平。”“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用人标准,把各方面优秀人才集聚到党和国家事业中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理念,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自觉贯彻党的群众路线,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的方针,深入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始终保持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必须坚持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健全民主集中制,不断推进党的建设制度化、规划化、程序化。”

“两个坚信”——“中国共产党人坚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颠扑不破的科学真理,坚信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从来不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是空洞、僵硬、刻板的教条。”

“三个永无止境”——“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永无止境。”

“一个崇高原则”——“我们党除了人民利益,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我们党坚持这个崇高原则,为一切忠于人民、扎根人民、奉献人民的人们提供了施展才华的宽广舞台。”

“五德”——“要坚持把干部的德放在首

要位置，选拔任用那些政治坚定、有真才实学、实绩突出、群众公认的干部，形成以德修身、以德服众、以德领才、以德润才、德才兼备的用人导向。”

“一个最高标准”——“90年来党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是我们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以人为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的性质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根本宗旨的集中体现，是指引、评价、检验我们党一切执政活动的最高标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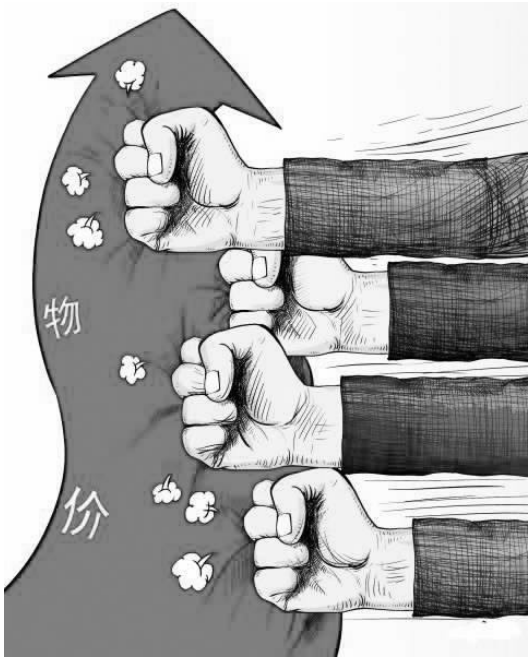
“一个最鲜明的特点”——“我国过去30多年的快速发展靠的是改革开放，我国未来发展也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是改革开放。”

“一个中心”——“我们要继续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坚定不移走科学发展道路。”

“四个继续”和“四个坚定不移”——“要继续牢牢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动摇，坚定不移走科学发展之路。”“要继续大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要继续大力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坚定不移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要继续大力保障和改善民生，坚定不移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

“三个没有变”——“我们已经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

“五个更加注重”——“我们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更加注重以人为本，更加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更加注重统筹兼顾，更加注重



改革开放，更加注重保障和改善民生……”

“一个硬道理，一个硬任务”——“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没有稳定，什么事情也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去。”

“三个最大限度”——“我们要遵循社会发展规律，主动正视矛盾，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不断为减少和化解矛盾培植物质基础、增强精神力量、完善政策措施、强化制度保障，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最大限度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减少不和谐因素。”

“两个宏伟目标”——“到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到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五个不”——“不动摇、不懈怠、不折腾，不为任何风险所惧，不被任何干扰所惑，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

——摘自《人民论坛》

省委召开全省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

8月19日，省委召开全省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经验交流会，深入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进一步落实中央关于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要求，对全面提高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科学化水平作出部署。省委书记罗志军在讲话中强调，要围绕又好又快推进“两个率先”的新任务，采取更加扎实有效的措施，推动学习型党组织、学习型领导班子建设向广度和深度发展，不断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理论素养、思想境界、知识水平和工作本领，以干部队伍思想理论的新进步、能力素质的新提升，开辟“两个率先”实践的新境界，开创科学发展的新局面。

省领导李学勇、张连珍、石泰峰、弘强、李云峰、杨卫泽、李笃信、蒋宏坤、李小敏出席会议并在主席台就座。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杨新力主持会议。

罗志军说，重视学习、善于学习是我们党在长期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根据世情党情国情的深刻变化，提出了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重大战略任务。省委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的决策部署，及时制定实施意见，对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作出具体部署，在强化科学理论武装、开展大规模干部培训、健全党委中心组学习制度、加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组织领导等方面推出了一系列新举措。全省各级党组织按照中央和省委的部署要求，围绕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结合开展创先

争优活动，不断增强学习自觉、丰富学习内容、创新学习方式、完善学习制度，扎实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取得了重要的工作成果、制度成果和实践成果，涌现出一批先进典型。

罗志军指出，江苏正处于全面实现小康并向基本现代化迈进的重要时期。根据胡锦涛总书记对江苏工作的新要求，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作出了全面落实“六个注重”、全力实施“八项工程”、又好又快推进“两个率先”的新部署。面对新形势、实现新目标，需要全省上下认识上的大统一、行动上的大自觉，更需要各级领导干部能力素质上的大提升。我们要把学习型党组织建设贯穿于又好又快推进“两个率先”全过程，按照科学理论武装、具有世界眼光、善于把握规律、富有创新精神的总要求，坚持以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本着“干什么学什么、缺什么补什么”的原则，深入开展大规模干部培训，大兴勤学善学之风，引导和推动广大党员干部学习新理论新知识新技能，以有效的学习提升党性修养和创新能力。要围绕强化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武装，突出加强党的创新理论学习，特别是要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不断提高思想理论素养，为坚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巩固共产党执政地位，为继续解放思想、推动实践创新打牢思想理论基础。要围绕实施“八项工程”，切实加强各方面新知识学习，尤其要学习一切科学的新知识，学习国际上现代化建设的新经验，以新的视野、新的理念推出新的思路、新的举措，确保每项工程每年都有新进展、五年实现大突破。要围绕发展阶段新变化，重视加强对“两个率先”规律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找准目标、明确方向、理清思路、开拓创新，努力走出一条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符合时代进步潮流、符合人民群众意愿的现代化建设路子。

罗志军强调，深入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首先要从抓好领导干部的学习做起。各级领导干部要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积极进取的精神带头学习，既要成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组织者推动者，又要争当学习型领导干部，做勤于思、敏于学、专于行的表率。要自觉把学习作为政治责任和精神追求，带头弘扬崇学美德，大兴勤学之风，探求善学之策，切实减少不必要的应酬，腾出更多的时间学习，下功夫提高自己，努力在全面系统掌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上走在前面，在学习掌握现代科学知识上走在前面，在弘扬理论联系实际学风上走在前面。要自觉带头钻研经典著作和研究重大现实问题，不断提高战略思维、创新思维和辩证思维水平，切实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要把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作为加强学习的基本途径，把眼界宽、思路宽、胸襟宽作为加强学习的重要目的，把创业、创新、创优作为检验学习成效的重要标尺，团结带领干部群众励精图治创大业、开拓创新闯新路、敢于超越争一流，努力使江苏各方面工作继续走在全国前列。

罗志军指出，要大力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把改进学风贯穿到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各个环节、各个方面，坚持学以致用、务求实效，真正做到学以立德、学以增智、学以创业。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坚定的理想信念，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持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增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自觉性和坚定性。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科学发展的能力，引导党员干部牢固树立和践行科学发展观，不断提高执行力和创造力，真正使学习的成果转化为实施“八项工程”的自觉行动，转化为推进“八项工程”的思路举措。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增进民生幸福的实际成效，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强化以人为本、民生优先的理念，（下转第35页）

漫谈社会管理创新

周毅之

社会管理创新这个话题是近年来中央特别关注,也是今年中央在总体工作布局当中抓得非常紧的一件大事。胡锦涛同志在今年“七一”讲话中指出:“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没有稳定什么事也干不成,取得的成绩也会失去,要使全党同志把这个道理牢记在心,也要引导全国人民牢记在心。”也就是说,我们要发展,要坚定不移地把发展这件事做好。但是发展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稳定。三十年来的中国如果没有稳定,不可能有今天的成就。我国能成为全球投资商的第一投资目的地,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稳定。

“七一”讲话中,“发展是硬道理”,解决穷的问题;“稳定是硬任务”,解决乱的问题。没有稳定就没有发展,没有稳定什么事都干不成,没有稳定原来取得的成绩也会失去。要发展就要搞经济建设,要稳定就要搞社会建设、社会管理,这就是我们今天的话题,也是非做好不可的事。

一、社会管理在目前中国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社会管理是一件事关人民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中国大体已经到了一个中等收入的发展阶段,仍然是一个发展中的大国,全国现在年人均 GDP 达 4500 美元,江苏是 7800 美元。中国这段时期的整体发展态势很好。1987 年时我国的经济总量是 1 万亿,到 2002 年达 10 万亿,2006 年为 20 万亿,2010 年则达 39.78 万亿,30 年平均增速为 12.6%,“十五” 期间平均增速为 12.9%,“十一五”期间平均增速为 13.5%。但在这个阶段,也是社会矛盾、各种问题和压力最为集中、最容易凸显的时期。世界银行总结了这个阶段许多国家的经验,包括拉美的经验、东南亚的经验作了一个总体分析,认为存在着一个中等收入陷阱,即一个国家的年人均 GDP3000~11000 美元, 这个时期最容易出问题,拉美出在这个时候,东南亚的有些国家像泰国等出问题也是在这个时期。那么,此时最容易出现的问题有哪些呢?世界银行作了分析, 认为有这样十个问题:一是增长停滞,因为原来经济增长粗放式的扩张已走到顶了,调节得好就冲过去,调节不好就下来。二是民主乱象,因为阶层冲突、部族冲突、民族冲突、文化冲突、内外冲突都会在这个时候集中出现,而集中出现的冲突都扛着民主的旗帜。三是贫富分化;四是腐败多发;五是过度城市化;六是公共服务短缺;七是就业困难;八是社会动荡;九是信仰缺失;十是金融体系脆弱,如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就是从泰国开始的。这几条告诉我们,3000 美元到 11000 美元之间存在着一个中

等收入陷阱的可能性。不是说每个国家都必然经过，如日本和韩国在这个问题上就解决得比较好，解决得最不好的是拉美的几个国家，如阿根廷。阿根廷从3000美元曾经冲到12000美元，相当不错。最后一年之内回落到2026美元，阿根廷货币对美元一夜之间贬值50%，3天之内贬值了几倍。

在这种情况之下，一个国家、一个地区要解决的问题在哪里？必须解决好两大问题：第一，原来的经济增长方式必须转变，粗放式的老办法搞经济已没有出路，用一般出口加工业已支撑不住，外部市场一紧缩你马上就关门。因此，中央才把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作为“十二五”的主线。

第二个问题就是社会矛盾集中，社会关系的转轨时期到来，社会管理必须及时跟上。如解决不好，社会不稳定、不和谐，将无法回避，就会出现乱象。这就需要解决社会管理创新的问题。

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和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是当前必须要抓好的两手，而且两手都要硬。但从现实来看，并不理想。在我省四月份召开的全省社会管理创新和加强新时期群众工作的会议上，省委书记罗志军同志直言不讳，指出我们有的同志存在着一手硬、一手软的问题，抓经济这手硬，抓社会管理这手软。随着时代条件的改变，随着社会矛盾的多发和社会管理格局出现新的变化，我们在管理思想、理念、体制、机制、法律法规、政策、方法、手段等方面与人民的要求、社会发展的需要还不相适应。这值得我们高度关注，它关系到人民安居乐业、国家长治久安的大事，如果办不好，稳定就保不住。稳定保不住，什么事都干不成。

二、创新社会管理的总要求

创新社会管理的总要求，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激发活力、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

1. 最大限度地激发社会活力。因为在西方工业化国家现代化发展的经验当中，发展和稳定、竞争与协调是一个无法解决的两难，是一个悖论。只要有市场经济在，这个悖论就无法解决。因为市场经济有个特点，它推动发展、激发活力的机制就是竞争，微观效益激发了企业行为，包括激发了个人行为。在市场经济这个竞争环境中，必然有竞争的得利者，也有竞争的沦落人。而市场竞争的这种得利者和沦落人在进入下一轮竞争当中，得利者处于竞争的优势地位，沦落人处于竞争的弱势地位，这种利益上的分化会加剧，这是无法回避的问题。此时，要解决社会的稳定问题，要解决社会的秩序安定问题就必须解决公平。你不能让得利者花天酒地，沦落人饿死、冻死街头，所以要事后补偿，即通过社会保障、各种社会福利、公共服务来保证事后一定程度上的公平性，编织社会安全网，把它兜住。

我们强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两个轮子一起转，这确实是好的。但仔细一想，两者之间是有矛盾的。西方国家认为是无法解决的悖论。我们要坚持科学发展观，统筹兼顾，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总结了前人很多的经验和教训后摸索出来的。我们必须一手托两家，既要发展，又要稳定；既要有活力，又要能和谐。也就是说，我们要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不致于使社会的稳定遭到破坏；在强调社会管理、实现稳定时，不致于使社会的活力受到打击。我们现在的各方面政策就要围绕这个目标去做。在市场经济的历史上，中国的统筹兼顾政策理念和思路是独一无二的，这就是我们的发明，也是中国人自己的路。你说是悖论，我说能兼顾；你说要么和谐，要么活力，两者不可兼得，我说两者能够兼顾。三十年中国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动乱，这种稳定的局面保证了我们的发展，这个经

验我们要继续坚持下去。

目前要千方百计增强活力，千万要防止一个倾向，用抑制发展、牺牲发展的思路来搞稳定、搞和谐，这是不足取的。还是要靠我们的领导，靠我们的决策层决策艺术和执政能力。

2. 最大限度地增加社会和谐因素。从根本上使社会和谐，关键点在改善民生，维护人民群众的权益，促进社会的公平正义。比如，江苏着力社会和谐，我们必须消除那些不稳定的因素，必须解决那些社会矛盾问题，但这里最根本的问题是要改善民生，只有民生问题解决好了，社会和谐才能有最根本的保障。在江苏，首先阶层收入不能差距过大，尤其是低收入阶层，必须有最低生活保障，如提高低保费，保证低收入人群最基本生活保障。只有把民生问题解决好了，我们才能最终解决社会的和谐问题。

3. 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主要是讲社会矛盾的化解，解决社会中那些不稳定因素。这个问题应该是我们在管理当中的一个突破口，要有效应对社会风险，保持社会的良好秩序。

三、形成新的社会管理格局

所谓新的社会管理格局是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我着重讲一下社会协同和公众参与。

社会协同主要讲的是社会组织的发育、健全和协同管理。也就是社会各方面的组织，比如工会、妇女组织、青年组织、学生组织、行业组织以及社会慈善机构、公益团体等等，共同来做社会管理，这是一般国家在现代社会管理当中都十分重视的事情，但是我们做得还不到位。如何形成公众自己的群众组织、社会组织来参与社会管理，形成一个多元共治的局面，非常重要。

公众参与这一条也很重要。我国是一个有2000多年小生产历史的国家，公共生活意识比较弱，居民的自治意识比较弱，这是我们国家社会管理当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把基层居民自治作为中国基本政治制度之一，但我们以前在这一点上做得还不够。一方面，我们现在有的街道和居委会的工作要转型，转向社会管理，组织居民自治。可是我们有的街道以往都是抓经济工作，应当把这些经济职能，如招商引资等从街道职能中剥离出来。除了这些基层的管理组织转型之外，居民也要有民主管理、民主自治的意识，管好自己身边的事情。

四、如何把握社会管理创新的突破口

中央很明确，社会管理创新的突破口就是要解决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突出问题有哪些呢？如南京市委书记杨卫泽在社会管理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坚决纠正征地、拆迁、改制当中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坚决禁止强征、强拆、强建；坚决不让群众在城市化、农村改造、企业改制当中利益受损。又如在今年四月份省委召开的社会管理工作会议上通过的决定，要三个攻坚：征地拆迁、劳动社保、诉讼三个方面的信访结案。因为这些问题都是不和谐因素，如不解决好，社会不得安定，国家就不能长治久安。

那么，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一是协调社会关系；二是规范社会行为；三是化解社会矛盾；四是做深入细致的群众工作。通过这些方式，维护整个社会的安定，维护整个社会各方面关系的协调，说到底就是稳定。有了一个稳定的大局，我们才能发展。如果没有稳定，什么事都做不成，取得的成绩也会失去，这是创新社会管理的真谛所在！

（根据周毅之在“江苏讲坛”的讲座录音整理，本文有删改）

基层理论宣讲工作的体会

近年来,围绕中央和省市委重要会议精神,我们淮安先后组织开展“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大精神”、“贯彻‘六个注重’,实施‘八项工程’,推进‘两个率先’、“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深入学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深入学习胡锦涛七一讲话精神”等主题宣讲活动。由于主题宣讲活动紧密联系省市实际和形势发展需要, 主题鲜明、重点突出、迅速快捷,深受欢迎。据不完全统计,我团在全市组织开展的集中主题宣讲达100余场次,直接受众近8万人次。具体做法是:

1. **精选主题,精心备课**。为提高理论宣讲效果, 我们十分重视宣讲主题的选择和宣讲人的备课准备, 做到四个紧密结合四个严格要求, 一是宣讲主题与上级要求紧密结合;二是宣讲主题与形势紧密结合;三是宣讲主题与“三民”(民情、民意、民需)紧密结合; 四是宣讲主题与地方重大决策部署紧密结合。备课准备上严格要求宣讲人政治观点必须旗帜鲜明, 宣讲内容必须贴近听众,宣讲素材必须生动服众,宣讲课件必须精致醒目。

2. **三级联动,五堂并举**。近年来,我们始终坚持把理论宣讲工作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采取了市、县、乡(街道办)“三级联动”,创新建立了领导讲堂、专家坐堂、党校课堂、手机学堂、市民讲堂的“五堂并举”有效措施,建成一个由100多家单位组成的全市理论宣讲工作网络平台, 一有宣讲任务,网络单位全员联动,确保了理论宣讲任务的高效率运转。有效实现了各级党组织学习的全覆盖,所有党员学习的全覆盖,使党员干部能力和基层组织战斗力得到全面提升,极大推动了理论宣讲工作。

3. **完善制度,严格考核**。为了推进基层理论宣讲工作规范化、常态化、科学化,提升基层宣讲工作的组织化水平,我们制定了理论宣讲工作五项制度:宣讲团员推荐、选拔制度、理论宣讲目标考核制度、理论宣讲问卷回馈制度、理论宣讲网络管理制度、理论宣讲备课会制度。努力把理论宣讲工作融入到宣传思想工作的大格局中,作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主要内容,对基层党委考核的重要指标,真正做到宣讲工作由软任务变成硬指标。

(中共淮安市委讲师团供稿)

以“学习力”提升“竞争力”

——南京市雨花台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实践与探索

在雨花区全面融入和建成主城区之际，如何聚焦“四个第一”，实现推动科学发展、争当“两个率先”标兵的目标，如何面对人民群众的新期盼，大力推进现代化创新型生态新城区建设进程，如何在“十二五”开局之年起好步、开好头，雨花区任重道远、锐意前行。雨花的做法是以“学习力”提升“竞争力”，以“竞争力”全面抢占雨花发展的“制高点”。

一、坚持走在“前列”，不断激发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内在动力

形成统一价值坐标，实施战略目标认同。区委坚持用先进的理念引导人，用光辉的事业凝聚人，用良好的作风吸引人，明确雨花的发展定位从“城市郊区”，到“城郊结合部”，再到“主城新区”，已经成为南京新的城市中心和南部新城的核心区；倡导“雨花的明天，就是全区人民的明天，没有雨花的发展，就没有个人的发展”；确立“建设现代化创新型生态新城区、建设中国第一软件产业基地、建设南京中国软件名城核心区和标志区”这一“大目标”，引导全区人民热爱雨花、支持雨花，坚定理想信念、增长知识本领、锤炼品德意志、矢志拼搏奋斗，为雨花在争创“三个第一”伟大事业中建功立业。

建立科学评价体系，激发内在学习潜能。区委始终坚持把学习“软指标”确定为“硬任务”，使学习从单纯掌握知识变为主动提高能力素质，真正做到以学习促进工作，以工作强化学习；坚持把党员干部的工作实绩与“述学”、“评学”和“考学”结合起来，把党员干部的学习情况与党员干部的奖惩、评优、晋升和使用挂钩，把理论素养、学习能力作为任用干部的重要依据；坚持把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列入全区精神文明千分制考核，把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情况纳入单位争先和个人评优的评价指标体系，积极营造“靠学习立身、靠素质进步”的浓厚氛围，使党员干部

充分认识到学习是素质之基、创新之梯、争先之源，持续提升党员干部学习的自觉性和主动性。

打造特色学习平台，强化干部队伍建设。努力打造学习教育“特色平台”，与高等学府开展联合办学，分别成立了“浦东干部学院雨花分院”、“井冈山干部学院雨花分院”，构建了本地党校——周边高校——国外培训机构”的干部培训模式；组织党员、干部进党校培训，进高校学习，上网学习，推行干部教育培训“3+X”、公务员培训“5+X”的学分考评管理机制；每年开展“好书我推荐”活动，一批结合雨花软件业、先进制造业和商务商贸业发展的好书在领导干部中传读；构筑网络学习互动平台，在雨花宣传网、雨花党建网上开辟《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谈》、《电子杂志》栏目；在区街机关干部中开展了学习之星、学习型家庭评选活动，使学习活动从个人延伸到家庭；开展领导干部课题项目认领活动，《努力建设创新型经济的先导区——雨花台区创新型经济发展的实践与思考》、《打造软件人才特区，助推主导产业腾飞》等一批领导干部文章分别获得省市级奖。

二、落实三个“转化”，不断提高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实效性

区委坚持把培训眼界宽、思路宽、胸襟宽的党员干部队伍作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的重要目标，更是把创业、创新、创优作为检验党员干部学习成效的重要标尺，把学习型党组织建设与人才引领、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特色之路有机结合，使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成为“促进学习力，提升竞争力”的有效载体。

“学习力”转化为“实践力”。区委把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纳入党建工作整体框架，坚持项目化管理、工程化推进、品牌化打造的总体思路，坚持把学习由室内延伸到室外，把研讨由课堂延伸到现场，积极推动学习成果转化。围绕雨花建设现代化创新型生态新城区的要求，先后邀请了台湾资策会副执行长龚仁文、中国信息产业部赛迪高级副总裁赵刚等两人主讲雨花智慧城市建设的可行性报告、河海大学教授陈刚主讲雨花区域营销战略报告。通过学习，全区党员干部正确认识到雨花发展是学习的多、自主创新的少；借鉴的多，自我品牌的少，依附和跟进为主的发展模式是相对优势，不是竞争优势，更不是发展优势；清醒认识到雨花科技、教育、人才、创新四大软资源和土地、资本、环境、配套四大硬资源与发展高目标还不相匹配；及时认识到青奥会筹办、南部新城建设、中国软件谷规划开发将是雨花发展的重大机遇，结合南京市委“三个发展”要求，区委制定了重点软件业、商务商贸业、先进制造业和生物医药业、文化创意业的“3+2产业”总体规划，2010年南京软件谷已成功落在我区，雨花软件园被国家科技部授牌“现代通信软件产业基地”。

“学习力”转化为“创新力”。区委坚持积极传播先进理念，拓宽工作思路，以学习推动创新精神的再激发、自主创新能力的再提升、区域创新体系的再完善、创新型人才的再集聚、自主创新环境的再优化。南京市副市长、区委书记李侃桢亲自上讲台为区委中心组成员、党员干部骨干作雨花“转型、创新和跨越发展”工作及理论辅导，并亲自撰写调研文章；区委常委们坚持深入基层一线，结合一般理论和创新实践为党员干部讲形势、讲政策、讲理论。通过学习，总体把握雨花的现状是经过多年的积累和嬗变，虽然从地域上快速融入主城，但城效结合部痕迹还很明显，城市文明程度、城市现代观念和城市功能品质与城市现代化进

程加速不相同步；社会建设和管理方式方法、机制水平与创造美好生活、建设人民幸福雨花不相协调，在此基础上，结合南京市委把雨花定位为南京的南大门，区委提出建成富裕雨花、人文雨花、活力雨花、法治雨花、生态雨花工作目标，并编制有关规划。

“学习力”转化为“执行力”。坚持以目标引领，积极描绘全区党组织和党员自身为之振奋的未来蓝图，以建设软件名城的核心区和标志区，建设现代化创新型生态新城区为目标，确立“学习就是发展、发展必须学习”的理念，转变思想观念、振奋精神状态，提高工作能力，促进工作落实，使学习成为推动工作落实的孵化器。区委坚持把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和创先争优活动结合起来，和“向心力”工程同步实施，和“双学双争”活动一并推进，先后开展向模范村官“武继军”和发展典型“桠溪”的学习活动，学习先进地区的先进理念，学习先进人物的改革创新精神，更学习他们面对竞争敢于争先、面对差距敢于奋进，面对矛盾敢于碰硬的实干精神，把学习型党组织建设打造成“内强素质、外树形象、驱动发展”的基础工程，使全区党员干部围绕科学发展主题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主线，立敢为人先之志，强争创第一的勇气，坚决把区委决策部署落到实处，全区党员干部在工作学习中形成你追我赶、相互比拼的良好氛围。

（中共南京市雨花台区委宣传部供稿）

【本栏责任编辑】孔鹏娟

（上接第 28 页）像抓经济建设一样抓好民生改善，像落实经济指标一样落实好民生指标，让老百姓感受到收入年年有提高、生活年年有改善。要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做好群众工作、创新社会管理的本领，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开展“三解三促”活动，带着深厚感情和政治责任，深入村组、社区和基层单位驻点调研，访民情、听民声、察民意、解民忧、增和谐，真正做到科学发展向上攀登、联系群众向下扎根，始终把群众放在心坎上，做人民的好公仆。

罗志军要求，各级党委要把建设学习型党组织工作纳入党的建设总体布局，作为党建工作创新工程的基础性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切实加强领导，精心组织实施，坚持分类指导，加强督促检查，确保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取得实效。各市、县(市、区)委要参照中央和省委的做法，建立健全学习型党组织建设工作领导(协调)小组及其办公室，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要建立联系点和示范点，加强分类指导，以点带面推进学习型党组织建设。要坚持用制度管学习促学习，全面推行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述学制度，把述学情况以及学习的整体考评结果作为综合考核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重要内容，作为领导干部选拔任用的重要依据。要创新学习方式方法，进一步拓展学习阵地，搭建便捷多样的学习平台，运用好互联网、手机等学习新载体，构建多层次、全方位、立体化的学习网络，使学习活动体现时代特点、贴近党员实际、富有实际成效。

苏州市委、常州市委、淮安市委、扬州市委、泰州市委、省发展改革委党组、省商务厅党组、江阴市委、新沂市委等 9 家单位负责同志在会上作了交流发言。

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党员领导同志，省法院院长、省检察院检察长，省纪委副书记，各省辖市党政主要负责同志，省有关部门、单位主要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省委宣传部理论处供稿）

对话基层理论宣传干部徐进：

大道理，也能讲得入耳贴心

走在县城的大街小巷，连修自行车的师傅也认得他；

到全县210个行政村，村干部几乎都叫得出他的名字；

……

这样的情况，放到县委书记、县长身上一点不稀奇，而对于一个普通的基层理论宣传干部来说，就不同寻常了。这位被群众视为“明星”的人，就是海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县社科联主席徐进。

（一）

9月19日下午，记者一行到海安采访，原定主题是“十大渠道畅通民意”。联系采访的徐进一见面就连声打招呼：“非常抱歉！马上我要请一小时假，去给卫生系统的干部作报告。”一旁的县委宣传部新闻科小涂告诉我们，徐部长上午刚到妇联作过报告。理论报告这么受欢迎，这引起了记者的极大兴趣，大家一商量，决定临时改变采访计划，跟随徐进去当一回他的听众。

在去会场的路上，记者见缝插针，与徐进有了第一次对话。

记者：如果让你讲三次产业，会怎样讲？

徐进：按照书本定义讲，很多群众可能不明白。我就讲：养羊是第一产业，把羊肉加工成火腿肠是第二产业，开个小店卖羊汤，这就是第三产业。

记者：有意思！如果宣讲中央对新农村建设总要求，你怎样讲？

徐进：新农村建设总要求是五句话——生产发展、生活宽裕、村容整洁、乡风文明、管理民主，涉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三个层面的要求，我对农民宣讲就七个字：民富、村美、风气好，这样更好理解。

记者：江苏强调全面小康建设不能以“平均数代替大多数”，怎么讲才更通俗易懂？

徐进：我作了一首打油诗，“张家有财一千万，九个邻居穷光蛋，平均起来算一算，个个都有一百万！”农民兄弟个个都能听得懂。

记者：服了！难怪你的报告这么受欢迎。

徐进：报告乏味，讲的人吃力，听的人无趣，效果等于零。我的尝试，就是要让党的理论宣传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二）

下午4点，徐进开始为70位干部作《从党的历史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的主题报告。原定1小时的宣讲，直到6:15才结束，台下未见一个人“走神”。

县红十字会秘书长王坚说：“我这是第四次听徐部长的报告。他把大道理讲成了大白话，生动有趣，很吸引人。”民营曲塘镇李庄医院院长柯军，专门开车20公里赶来县城，就是为了听这场报告。他说，回去以后，要把徐部长的报告内容讲给院里的14名党员听。

晚饭后，记者又和徐进有了第二次对话。

记者：我们注意到，下午两小时一刻钟的报告会，共响起了23次掌声。原来党的理论宣传也能讲得这么入耳贴心。

徐进：理论宣传要让群众感兴趣、能接受，首先要自己信，要有坚定的信仰。自己不信，怎么让人信？

记者：还有呢？

徐进：对宣讲内容要细嚼慢咽，融会贯通。自己一知半解，以其昏昏，岂能使人昭昭。另外，就是要做好“翻译”工作，到什么山唱什么歌。

记者：比如呢？

徐进：下午给卫生系统讲，就考虑了医务人员的特点。在讲到保持经济健康运行需要防止“高投入、高能耗、高排放”时，我就以“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这“三高”来比喻经济运行中的“亚健康”。

记者：难怪台下听众直点头。

徐进：再比方说，为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中央出台4万亿元投资计划，我就比作西医的急诊，下的是一剂猛药；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则如同中医讲究调理、平衡，为的是让发展的质量、结构、效益、速度相协调。

记者：我们注意到，你作报告时没有一纸讲稿，感觉都是即兴发挥。

徐进：功夫在诗外。即兴发挥的背后是日积月累。要给别人一滴水，自己得有一桶水。很多人怕开会，而我对各种各样的会不躲不代。一小时的会，哪怕只有一句话对你有用，也是一种收获。

记者：听说你从不打牌？

徐进：我的业余爱好就是读书看报，每年都要花几百元从网上买书。前两天，省里一家出版社的编辑来海安，跟我聊得很投缘，回到南京，给我寄来了一大包理论书籍，够读一阵子了。

（三）

听了下午的报告会，海安县人民医院和中医院的负责人当场走上讲台，约请徐进去作报告。一场超时报告，引出两场“计划外”的报告，记者就此与徐进有了第三次对话。

记者：在海安，在南通，你快成明星了！

徐进：哈哈！我的粉丝中，还有不少女同胞呢！

记者：作报告占用了你很多时间吧？

徐进：最近5年已经讲了200多场。实际上，我还有很多行政工作要做。但是，有人请总是好事，我乐意。这个月初，你们《新华日报》刊发介绍我的报道后，约我去作报告的电话更多了，最多一天接到五六个。

记者：200多场，听众应该很可观吧！

徐进：大概超过20万人次了。

记者：都在什么场合宣讲过？

徐进：党委、政府组织的培训学习、专题教育，像公务员培训、军转干部培训、村干部轮训、党员发展对象培训等等。规模最大的一次，主会场加广播转播，听众超过3000人。

记者：大家都请你去讲些什么内容？

徐进：有讲科学发展观的，有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有讲党的先进性建设的，还有讲新农村建设的。这几年党的理论创新出了一系列成果，这一块的素材很丰富，基层也很关心。

记者：比如？

徐进：干群关系事关社会和谐。当前农村干群关系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我将它概括为“不偷不抢不怕你，有吃有穿不求你，外出打工不理你，家里有事还找你，稍有不慎会告你”。实际上，是通过幽默诙谐的语言提醒基层干部，要学会做新时期的群众工作。

记者：理论宣讲受欢迎，你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徐进：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中国化、时代化成果的宣讲，中央有要求，基层有需求，关键要靠理论工作者当好桥梁和纽带，真正让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为基层干部群众了解、接受。这就是我的职责。

（执笔人：周跃敏　许建军　陈明　陆峰）

——摘自《新华日报》

“黄金谈”：思想圣火的辛勤传递者

大学的生活是精彩纷呈的，但常有人说：听过一次讲座，丢过一次自行车，谈过一次恋爱，这样的大学生活才圆满，可见讲座在大学生心目中的神圣地位。在河海大学，说起最受人欢迎的讲座，莫过于“黄金谈”了。“黄金谈”并不是一个人的名字，也不是一个经济学的术语，而是黄明理、金林南、谈育明三位教授的合称。河海大学社团活动如能够请到他们集体开讲座，便被视为最成功的活动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三位都是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老师，尤其是他们所开设讲座的主题基本上都是马克思主义方面或关于时事政治方面的。他们那倍受听众推崇的讲座完全颠覆了关于人们不爱听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的传统认知。

一、在幽默中体验深思想的火花

在“黄金谈”举行讲座的时候，就连在报告厅外的人，也常常听到一波一波如潮水一般的掌声和笑声。听众们毫不吝惜地用这种方式表达对三位教授如珠妙语的赞赏。“‘黄金谈’的讲座同学们都喜欢听，三位教授都很风趣，但是细细想来，其中蕴含着很多深刻的、我们自己无法触及到的哲理和真理。”

黄明理教授擅长于马克思主义信仰、幸福观和价值观方面的内容，他的特点是善于将大道理化为小道理并将它说得有道理，原本很枯燥的课题到他那里就活起来、生动起来了；原本很简单的甚至有些庸俗的一则手机短信到了他那里就具有了深刻的道理。他还被同学们戏称为“大学生爱情导师”，他常用调侃的方式把当代大学生婚恋观中出现的问题娓娓道来，批判得淋漓尽致，让你觉得自己被批得痛并快乐着。金林南教授的专长是西方哲学，他总能在纷繁复杂的问题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关键点。高度思辨性的语言与独特“金式幽默”的结合，颇有几分苏格拉底的风范。谈育明教授擅长以古论今，从中国历史中的各种事件出发，指出今天我们可以从中借鉴和思考的方向。同学们在聆听中不仅了解了有趣的历史故事，还领略了一个分析问题的全新视角和确立了正确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谈教授特别善于煽情，总能让你激情澎湃。“黄金谈”之所以吸引听众，不只是他们的幽默、民主，更是由于他们思想的睿智，难怪同学们都说，“黄金谈”的讲座不仅是欢乐的盛宴，也是思想的盛宴呢。

二、在聚焦热点中传播马克思主义

“黄金谈”讲座的内容大多离不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如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等）方面的严肃主题，这类主题的讲座也许在其它地方人们未必爱听，但在河海大学却绝对是个例外。“黄金谈”的成员中有的是

江苏省委科学发展观宣讲团成员、河海大学研究生青年思想者论坛的“坛主”、河海大学青年马克思主义培养工程的顾问、大学生辩论队教练。每年河海大学“金水节”的开幕式,青年思想者论坛便是主打节目,而“黄金谈”便是其主角。他们敢于在论坛中以“改革开放30年成就与反思”、“建国60年辉煌与挑战”为题开坛,居然论坛现场还能人山人海,座无虚席。真是“有实力就有魅力、有思想就有市场”。

“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大学生除了完成本身学业,对我国社会发展的大势或国际国内的重大热点问题也特别关注。在“黄金谈”看来,满足同学的需要进而培养他们对社会的责任就是他们的崇高使命,“改革开放30年成就与反思”、“建国60年辉煌与挑战”、“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政治有怎样的影响”、“拉登被击毙后全球恐怖主义的走向怎样”、“利比亚战争是怎样体现国际社会正义观的转变”、“当前价值观异化与信仰危机”、“马克思主义信仰面临的挑战”、“马克思主义信仰与大学生”、“马克思及其当代效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创新”、“科学发展观与的人幸福建构”、“科学发展观的战略意义”、“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促进大学精神的生成和发展”、“从唐山大地震到汶川地震看中国历史性变化”等这些热点话题或重要政治命题都可以在“黄金谈”的讲座中找到。三位教授分别以自己独有研究视角从不同方面解读当前社会的热点话题和重要时政话题,让同学们从全新的层面去思考整个社会生活、领悟党的重大方针政策。

在上海世博会举行期间,三位教授参加了河海大学举办的世博主题论坛。黄明理教授以自己世博之旅的亲身经历,为听众们分析了中国举行世博会的宏观意义。金林南教授与谈育明教授也分别从哲学和历史的角度对世博和中国崛起做了精妙的发言。让同学们在游览世博美景之后能发起更深层的思考。小到一则新闻,大到国际局势,三位教授都能顺手拈来,将其归入自身的理论体系中,让同学们充分感受到了学术渗透入日常生活中的独特魅力。在各次讲座中,三位教授也毫不避讳地指出当前的一些社会问题。在“梧桐树事件”、“汉口路西延工程”等问题上发挥了专业知识分子的话语权,指出政府在处理一些民生问题中的不足。金林南教授还开通了微博,在这一平台上对当前时事发起及时和睿智的点评。他们的行动正是陈寅恪先生提出的“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的写照。

三、在亲切的关爱中塑造健全的人格

一次在南京艺术学院举行讲座,恰逢天降暴雨,偌大的会场只坐了稀稀拉拉数十位同学。但这丝毫没有影响“黄金谈”讲座的精彩程度。三位教授依然全力为到场的同学献上一场精彩的讲座,并与同学们进行了长时间的互动。“把话筒交给学生们,让他们加入到交流中来。”讲座中金林南教授多次这样要求。

近三四年来,三位教授一直义务为同学们举办讲座(每年都要在校内外开设几十场次),与大家分享自己的最新研究成果或对热点问题的独特思考。但三位教授的讲座绝不是灌输,他们一直都认为:“让学生们学会独立思考比照搬我们的观点有意义得多。”因此他们在讲座中总是循循善诱,指出一个方向,给同学们的思想以发挥的空间。三位教授也不断地对自己的理论进行反思和超越,向同学们展露了一幅理论逐步成熟的画卷。在三位教授努力塑造的这种自由平等的氛围下,同学们也都愿意在交流环节与三位教授争论一些问题,表达自己的看法。他们从不会因为学生提出什么让他们“难堪”或

幼稚或愚蠢的问题而不悦，相反，他们总是以能够听到学生的诚恳批评和真心话而高兴。“欢迎批判”这是他们的口头禅，因此，听众有时觉得能够得到“黄金谈”批评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谈育明副教授曾说：“大学的教育是要从两方面着手的，既要积累知识，又要塑造人格。”事实上，三位教授的儒雅风范就是一部活的教科书，是在潜移默化中实现了对学生健康人格的塑造。黄明理教授是河海大学各个学院每年新生入学教育的常客，他就如何应对大学生活的挑战进而使四年大学满载而归传经送宝，并用行动诠释了青年人强身健体之意义。

四、与日俱增的影响，挡不住的魅力

“黄金谈”名字何时兴起已经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个名字是学生们的智慧，是他们对三位教授内心敬重之情的表达。其实，他们早已是河海大学的“名嘴”，在校园文化讲座中到处可以都见到他们的身影，他们的足迹不仅活跃在江苏各大学校园中，南京图书馆、苏州市委党校、大型企业、江阴大讲堂、洪泽广场大学堂等都有他们的身影。“改革开放30年成就与反思”、“建国60年辉煌与挑战”这样看似宣传性很强的枯燥主题，“黄金谈”居然都能把它们演绎得让学生痴醉不已，100多人的教室里竟然挤进了500多听众，主办方不得不换到一个更大的会场。到现在为止我们也无法理解为何“黄金谈”的讲座会有如此大的魅力，能够使听众宁愿席地而坐或站在窗台上3个小时！教育部社政司领导听到这一情况时（即关于改革开放30周年成就与反思方面的讲座能如此吸引学生）大为赞扬；《光明日报》记者慕名采访并作了报道（2011年1月27日）。“黄金谈”不仅在传播着快乐与思想，还传递着一种无私奉献的精神，他们精心准备的一场讲座的“报酬”通常只有一束鲜花和一杯水。然而，他们始终快乐地坚持着，听众的掌声和内心的敬重就是对他们最好的报答。每当人们为他们的精彩而赞叹时，他们总是谦虚地说：“不是我们讲得多么好，而是工科的学生太需要。”

“黄金谈”他们是思想圣火的辛勤传播者，特别是他们在宣传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果、推动其大众化、培养学生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方面所作出的努力和贡献将为听众所铭记，将为河海大学乃至历史所铭记。

（执笔：吕昂　曹天航）

【本栏责任编辑】孔鹏娟

创新社会管理要重在社区

张　舒

社区是社会的细胞，抓好社区建设，构建和谐社区，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是实现社会管理的重要方式。因此，创新社会管理，就要重在社区，让社区居民切实感受到加强社会管理给他们带来的好处，从而积极投身于社会管理，有效化解社会矛盾，为国家长治久安和人民的安居乐业打下坚实的基础。

引导社区群众参与管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深入，生活在单位制下的“单位人”逐步变成“社会人”，社区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场所，其功能和地位日益凸显。从某种意义上说，社区稳定则社会稳定，社区和谐则社会和谐。加强社区管理要从两方面着手：一是加强政府的管理和调控。通过社会政策和法规等来规范社会组织，调整社会利益关系，回应社会诉求，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公正、社区秩序和社区稳定；二是完善群众自治组织，加强社区居民依法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自我监督的意识，不断完善诉求表达机制，引导群众依法理性表达诉求，让社区居民有说话的权利、出气的机会，不致于因小失大，骤生事端。从一些地方突发的群体事件看，多数是因为诉求机制没有很好建立，群众情绪无法疏导，或信息不对称，群众不明真相，进而造成矛盾扩大化，最终酿成突发事件。

以创新促管理。从社区角度看，所谓创新，主要是加强服务。对政府来讲，应强化行政管理，有效提高公共服务。因为群众是最讲实际的，口号喊得再响，表态表得再好，如果不采取有效的手段，创新社区管理就会流于形式。因此，政府应积极作为，真正实行以创新促管理。一是通过加强法制建设、规范社区居民行为准则来推进社区管理。社区管理部门及其工作人员应带头守法，依法办事，为居民做好榜样；二是要为社区居民创造安居乐业的环境，保证地方性公共产品、社区公共产品的有效供给，尤其是对居民的衣食住行要保持足够的关注，保障居民最基本的生活条件。如南京市今年7月正式调整城乡居民最低生活标准，其中江南八区城市低保从400元提高到500元，调整幅度为历年来最高，深受居民欢迎；三是要处理好管理和服务的关系。既强调管理，又寓管理于服务之中，问民、访民、听民，认真采纳和接受居民的合理意见，努力满足居民需求。

建立应急管理联动机制。社会管理涉及方方面面，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在当前情况下，发展不平衡、不协（下转第60页）

整合国企内部监督机制的设想

余瑞国

虽然国企内部监督方式都在正常运作，都在从不同的角度去履行监督职能，但在监督实践中往往是各自为政，形不成合力。纵观国企内部所有的监督现状：纪委监察的监督是公开、张扬而强势的监督，职代会的监督是低调、含蓄而温柔的监督，审计和财务监督是受宠、乖巧而潜移默化的监督。因此，笔者就整合国企内部的监督机制问题提出如下设想：

改纪委书记为派遣制。纪委负责人由现在的上级组织委任(与本单位选举产生相结合)的体制改为所在政府党组织派遣制。纪委负责人的工资等生活福利待遇与被派遣的国企彻底脱钩。常言道："吃了人家的嘴软，拿了人家的手软"，这句话用在目前纪委书记身上也适用。因此，这是提高国企内部有效监督的唯一途径，否则监督就乏力或者成为无效监督。纪委书记享受国企正职待遇，除了履行《党章》规定的权力，可以赋予纪委书记(相当特派员)特权。

实行组织监督和民主监督的融合。国企的工会主席兼任纪委常务副书记，并享受本企业副职待遇。在按照《工会法》和《企业法》履行民主监督职能的同时，在国企领导班子成员向职代会述职述廉，职代会民主评议国企领导班子成员，职工代表审议福利费、招待费报告的真实性，前期准备工作方面要按纪委的要求，辅之于必要的监督手段提前介入，对不真实的部分，甚至可以启动否决相关议案的法权。通过组织监督和民主监督的有机结合，形成合力，增强监督的有效性。

组建一支精干的监督办案队伍。一是按惯例，行政监察、人力资源、财务、审计人员必须是纪委委员，按《党章》规定纪委委员必须选举，由党代会产生，但有关人员(如财务等)由于平时在履职时严格把关，得罪了一些人，不一定能选上，因此，为了强化纪委的力量，纪委员也可以委任。二是纪委办公室主任也要实行派遣制，享受本企业内部部门正职待遇。因为这一角色很重要，纪委书记是抓方向宏观的，许多治标与治本规划的落实，都要有办公室主任去抓落实，其职责按《纪委条例》处理纪委的日常工作，没有案件时主要抓党风廉政教育和廉政文化建设。三是创新办案方式。实行招标办案制，遇有查办案件时，由纪委会决定实行招标办案。所谓招标办案，就是根据案件的性质、违纪金额以及案(下转第 47 页)

系统思考：科学发展观和学习型组织共同方法

钟国兴

科学发展观的方法是什么，学习型组织的方法又是什么？人们一般不会想到把两者联系起来，但是非常值得关注的是：科学发展观和学习型组织的方法是同一种，都是系统思考。所谓系统思考，就是把系统方法运用到思考问题、解决问题方面形成的思维方法。

科学发展观的方法是系统思考

说科学发展观的方法是系统方法或者说系统思考，并非是盲目猜测和勉强联系，而是有实际根据的，根据就是胡锦涛的一次谈话。2008年春节前夕胡锦涛去看望钱学森时说：“钱老，您在科学生涯中建树很多，我学了以后深受教益。”胡锦涛谈起钱学森提出的系统工程理论，“上世纪80年代初，我在中央党校学习时，就读过您的有关报告。您这个理论强调，在处理复杂问题时一定要注意从整体上加以把握，统筹考虑各方面因素，这很有创见。现在我们强调科学发展，就是注重统筹兼顾，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

钱学森对于20世纪兴起的主流方法——系统方法非常感兴趣，他不但研究系统方法，而且由于所从事中国火箭和航天事业的需要，就把系统方法运用到工程管理上，提出了系统工程学。系统工程学同国外的项目管理学有异曲同工之妙，都是运用系统方法来管理工程，把整个工程看作一个系统，而且把大系统看做是由若干子系统组成的，整个系统各个方面、各种因素要统筹规划、周密安排、规避风险、协调推进。胡锦涛对钱学森讲这段话给我们透露的明确无误的信息是：(1) 胡锦涛80年代初在中央党校学习的时候，就读到钱学森关于系统工程理论的报告，认为很有创建，印象非常深刻，因而受其很大影响；(2) 胡锦涛从钱学森的系统工程理论中学到系统思考方法后“深受教益”，后来把这种方法运用到社会发展上，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之后提出了科学发展观；(3)科学发展观中的注重全面协调可持续的统筹兼顾方法，

实际就是系统思考方法的具体体现。可见，科学发展观是有其明确的方法论来源的，其方法是现代科学方法——系统方法或者说系统思考方法。

科学发展观的方法是现代的系统方法。为什么不是矛盾方法？毫无疑问，矛盾方法肯定是科学发展观的方法论的基础之一，但是是否是其直接的方法还是值得研究的。因为《矛盾论》是毛泽东在战争年代写出的著作，这篇哲学著作对于指导中国共产党取得战争胜利起到了作用。但现在看来，由于这篇著作是战争年代写出来的，不可避免地印上了战争年代的思想痕迹。这种痕迹最主要的表现就是强调矛盾双方的对立是绝对的，矛盾的解决方式是一方消灭另一方。这种观点如果直接用于实现科学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是有一定问题的。尽管从发展的意义上说，将来这样的理论问题应该能够得到解决，但是目前直接地、全面地运用仍然存在一定问题。

中国哲学一直是强调平衡、和合、和谐，这是中国文化中方法论的关键。长期以来人们有一个很深的印象，以为中国文化中所讲的阴阳就是一对矛盾。这种观点来自《矛盾论》。其实深究起来阴阳并不是《矛盾论》里面所讲的矛盾。为什么？因为中国文化讲阴阳，都是强调阴阳和合、阴阳平衡，追求的是阴阳协调、和谐，从来没有讲阴消灭阳、阳消灭阴。例如中医讲肾阴肾阳，没有任何中医要用患者的肾阴去消灭肾阳，肾阳去消灭肾阴，如果真的这样做了，患者一定是活不成的。所以懂得中国文化的强调的是阴阳和合、阴阳平衡是极端重要的，千万不要把阴阳理解为斗争是绝对的、必须一方消灭另一方，否则就从根本方法和灵魂上否定和断送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血脉。

科学发展观不但运用了国际上主流的系统思考方法，而且继承和运用了中国传统文化关于平衡、和谐的思想方法。这两者的有机结合，使得科学发展观在方法论上比较全面和完善。

学习型组织的方法也是系统思考

学习型组织其实也是组织学习，或者说是组织学习的一个发展阶段。组织学习并不是行政化学习，和我们习惯的上级一声令下，一个单位就整整齐齐地看书、念文件加表态的学习并不是一回事。组织学习是市场经济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出现的学习模式，而信息化和不断加速的全球化成为了它的强大助推器。组织学习理论包括行动学习法、双环学习、T 型管理、头脑风暴法、创新管理、知识管理、第五项修炼等等。到了 1990 年彼得·圣吉的《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一书出版，学习型组织这一理念开始广泛流行。实际上一直到现在，彼得·圣吉担任的都是美国组织学习协会(SOL)主席，他并没有认为组织学习和学习型组织有根本区别。

学习型组织也就是组织学习，是在市场经济趋于成熟和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的产物，因为这个时代每一个组织都必须面对不断出现的复杂问题的挑战，因此学习必须实现几个方面的大转型：一是以书本为中心的学习必须转变为以问题为中心的学习；二是以提高素质为目的的学习必须转变为以提高能力为目的的学习；三是灌输式的学习必须转变为研讨式的学习；四是个人化的学习必须转向组织化的学习；五是人生一个阶段的学习必须转变为终身学习；六是单一学科的学习必须转变为兼容的学习。组织学习和学习型组织理念反映的就是这种要求。这些转型充分体现在组织上，就是学习型组织；体现在城市上，就是学习型城市；体现在社会上，就是学习

型社会;体现在政党上,就是学习型政党。因此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社会等等,反映的是学习的一场大转型、大革命,其学习方式并不是传统的看书学习的简单延续。如果把它理解为传统学习的简单加码,那就南辕北辙了,而且这样理解永远也不可能建设成学习型组织、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政党。

学习型组织的方法是什么?其实1940年在英国出现的行动学习法,体现的就是系统思维,尽管当时系统方法作为一种方法论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因为行动学习法强调的是从问题出发、明确目标、找到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双环学习是美国组织行为学家阿吉里斯提出的,这种理论和学习方法强调要看到问题之间的系统关联,给出一个双环认知模式,从而让人们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其实任何组织学习理论都强调要系统地看问题、系统地解决问题。

学习型组织重要代表作《第五项修炼—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务》一书的作者彼得·圣吉是系统动力学创始人佛瑞斯特的学生,彼得·圣吉从导师那里学到系统思考方法之后,继续了前人运用系统方法研究组织学习、在推进组织学习上体现系统要求的做法并且进一步重视系统思考方法的运用,这一点充分地反映在他的著作之中。彼得·圣吉的五项修炼是自我超越、改善心智模式、建立共同愿景、团体学习、系统思考。值得注意的是他并没有把这本书叫做"五项修炼",而是叫做"第五项修炼"。之所以叫做"第五项修炼",是因为彼得·圣吉把排在第五项的系统思考看作是学习型组织的根本方法,是必须贯穿于其他四项之中的。事实上彼得·圣吉的这本书以及其他著作如《必要的革命》等等,都充分体现了系统思考的要求。

学习型组织的方法是系统方法,这是因为学习型组织离不开系统方法,离开系统方法也就不成其为学习型组织。因为组织学习要解决的是组织在这个时代所面对的复杂问题的挑战,要找到全面、根本解决问题的途径,离开系统方法是办不到的,任何方法都不能代替这一方法。

系统方法是系统化时代的基本方法

系统方法为什么会成为科学发展观、学习型组织的共同方法?这主要基于两个原因:第一,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世界被信息化、全球化紧密地连结为一个复杂系统的时代,这个时代的问题必须用系统的眼光来看、用系统的方法来解决;第二,科学发展观和学习型组织的目的是基本相同的,要解决的是组织或社会不断升级发展的问题,解决这样的问题都需要系统方法。

在中国,系统方法总是被人们和辩证法混为一谈,以为只要把事物看作是"普遍联系的、运动的、变化的、发展的",就是系统思维。当然系统方法符合这样的特征,但是并非仅仅如此。借用百度的解释是:"把对象作为系统进行定量化、模型化和择优化研究的科学方法。这种方法经历了从哲学到科学、从定性到定量的过渡,它是在现代科学、特别是系统论和控制论得到发展时建立的。其根本特征在于从系统的整体性出发,把分析与综合、分解与协调、定性与定量研究结合起来,精确处理部分与整体的关系,科学地把握系统,达到整体优化。"

系统方法和辩证法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在于辩证法只是一种哲学方法,而系统方法是一种科学方法。这就像哲学上的原子论和科学的原子观不是一回事一样。科学更加重视的是实际模型的研究和把握以及量化分析。系统方法至少注重这样几个问题:第一,把事物看作是功能的耦合,因此重视其互动

模式的研究,而不是一般的既这样又那样的辩证关系认识;第二,在各种模式中,重视各种因素的质量和数量变化的关联性分析,而不止是定性分析;第三,追求目标的整体优化,因此注重从根本上、整体上解决问题,而不止是抓主要矛盾。

很显然,系统方法和辩证法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这丝毫没有问题,两者也应该是互相支持的。但如果谁以为系统方法就仅仅是一种类似辩证法的哲学,那么就误解了系统方法,这时作为哲学的辩证法就会成为具体的、科学的思维的障碍,因为你满足于笼统的颠来倒去的辩证关系而不能去具体深入地分析问题。例如在研究一种社会事件的时候,是找到其具体的互动关联甚至系统模型,还是满足于处理好几个方面的辩证关系?是最后找到最优化、最根本的系统解决方案,还是满足于处理好主要矛盾?仅仅有后者在这个时代是不够的。

学习型组织建设的链式学习法

学习型组织的方法是系统方法,也就是系统思考。但是系统方法并不是笼统的哲学方法,它往往靠一系列系统的模型或者模式来认识和解决问题。在《第五项修炼》一书中,彼得·圣吉给出的九大"系统基模"就是这种模型,可惜这种模型对于习惯哲学辩证思维的中国人来说还不太习惯,难于接受、难于理解。其实运用系统思考方法,还可以建立更适合中国人的学习型组织方法模型。

链式学习法就是一种适合中国人的学习方法模型。之说以提出链式学习法,是因为进行学习型组织问题研究多年,发现"第五项修炼"等"外国药方"并没有治好中国学习上的"病",因为中国学习上的"病"有四大症状:简单化、灌输式、形式主义、运动化。这些是外国很少有的,而且有也不严重,因此国外的学习方法并没有针对这些来提出解决办法。而没有针对这些的具体办法的方法传到中国来之后,不但不能治好这些病,而且会被这些病所扭曲。这种扭曲并不能证明中国不需要搞学习型组织,而是说明中国需要更为实际的有针对性的方法。

到现在为止,中国人其实还没有学会在市场经济和信息化、全球化时代进行学习,还只是把捧着书本和文件阅读加表态当做学习的基本模式,其实这个时代的学习应对的是不断出现的复杂问题的挑战,因此学习过程是一个找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带着问题学的过程。这个过程共包括六个环节:找到问题——小组研讨——自主学习——知识共享——深入研讨——突破创新。也就是说,一个组织学习首先要发动大家把存在问题找到,列出一个问题清单来;第二步是让大家围绕重点、难点问题自由自愿地建立小组来研讨,这样的小组要充分平等民主;第三步是每个人带着自己的问题去自己做主学习,而不是凡学习都由上级指定若干读物;第四步是给大家创造条件搭建各种平台,交流各自的学习所得和体悟;第五步是学习后深入研究问题,找到问题背后的问题,拿出解决问题的方案;第六步是实际解决问题,实现创新。当然这个过程是大体的,经常是交错进行的,而不是截然分清的。

链式学习法的六个环节实际上首先来自国外学习实践,人家的学习就是这么做的,已有的国外学习型组织理论之所以没有在这方面进行充分的分析论证,是因为找到问题、小组研讨、自主学习等在人家那里是习惯性的常识,是不言自明的。其实这些做法也是中国学习型组织搞得比较好的单位的做法,例如山东青岛港、河北峰峰集团、长春市纪委等。

链式学习法就是系统方法在学习上的

应用,链式结构是系统的一种相对简单而且存在广泛的结构,如基因链、生态链、产业链、因果链等等。要改变人们简单化的思维方式,首先要从链式结构开始。链式结构体现在思维上就是链式思维、链式思考,这种思考既不是孤立地看问题,也不是简单的对立统一关系式的思维, 还不是模糊思维,因此可以抓住问题的基本逻辑,进行科学的分析和把握。

链式学习法提出后,包括人民网、央视网、光明日报、求是杂志、解放军报和多数省级党报党刊、网站都进行了评介和报道,全国难以数计的单位在用这种方法改变传统学习,媒体报道的大小单位就多达上百家。可见科学的学习方法确实是社会所需。

建设学习型组织就是落实科学发展观

科学发展观有一个如何落实的问题,而落实科学发展观不但需要具体的方法,而且需要组织的支撑。什么样的组织才能落实科学发展观?这种组织必须具备如下几个特征:第一、具有信息化、全球化时代的现代理念,特别是现代发展理念;第二、直面问题,能够不断找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第三、善于系统思考,组织的团队智商比较高,能够集中大家的智慧解决发展中面临的复杂问题。离开这些,落实科学发展观就是一句空话。那么什么样的组织具有这样的特点?当然是学习型组织,其实这种学习型组织也就是创新型组织。

因此,建设真正学习型组织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关键,而建立学习型组织关键是能否让组织及其每一个成员真正学会系统思考,真正按照科学的学习方式去学习,而不在于发多少文件、提多少学习口号、指定读多少书、搞多少学习活动、表彰多少先进,做多少高调宣传。

理解了建设学习型组织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之间内在一致的关系,也就理解了什么是学习型政党,理解了建设学习型政党为什么是重大而紧迫的战略问题,以及如何建设学习型政党。要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国共产党本身就必须成为真正的学习型组织,传统的学习必须转型,传统的思维方式(《第五项修炼》中称为心智模式)必须转型。而且只有中国共产党自身成为了真正的学习型组织,才能引领好中国学习型社会和学习型组织的创建。

(作者系中央党校《理论动态》主编、学习时报副总编)

(上接第 42 页)件的大小和规模,确定几个档次, 就是查办一起案件要多少钱?实行“三包”即:包时间、包人员、包经费。所需人员根据案件查办情况,招标确定,当然不排除外界司法人员中标的可能,重赏之下,必有勇夫。最后有纪委办公室主任去抓落实,负责签订办案协议等事项。这种招标办案的方式,好处是可以缩短办案时间,提高办案质量。

总之, 国企的内部监督是企业健康发展的永恒主题,而且是降低监督成本,治理腐败的关口前移的治本之策, 只有不断探索,不断创新,才能够把国企领导人的腐败降到最低限度,最终达到根治腐败。

(作者系中国铁通江苏分公司审计纪检监察部部长)

【本栏责任编辑】孔鹏娟

重读马克思

聂锦芳

时序已经推进到21世纪,距离马克思生活的年代已经过去近120年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运动和思想研究还在继续进行着，特别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和理论呈现出勃勃生机和强大的创造力。但认真观察国内外、学术界内外的实际情形,我们也必须看到,作为19世纪中下叶德意志民族一代思想大家的马克思,某种程度上在当代其实“已经悄然退场”。就学术界看，人们在他的名目下阐发了那么多新潮的思想，实际上已经远远超出他当年观察和思考的界域，增添了很多不属于他的意旨和内容，更不用说还有意无意的曲解和误读。更为复杂的情形是,在“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一个半多世纪的演进历程中，很多论者对马克思及其文本和思想的理解和阐释加入了过多的现实考量和情绪成分，以致出现了这样的情形:言说马克思的人越来越多,“挖掘”和阐释的思想越来越新颖，但马克思本来的形象和思想却越来越模糊，人们对他的文本越来越不熟悉。在人类思想史、哲学史上,一种流派在传承过程中出现这样的现象可能并不鲜见，但对于远未穷尽的马克思主义宣传和研究来说,这种状况显然是不正常的,并且是亟待改变的。

■ 反省以往的解读方式 ■

置身于21世纪，来重新观照和解读马克思19世纪的文本,显然绕不开20世纪所奠定的基础和积累。然而,在穿越一个多世纪的风雨征程、已经为数不清的人们所翻译、注释、解析和宣传之后,我们今天仍感到有重新研究这些文本的必要,暗含的一个前提是,过去的文本解读方式及其所取得的成就并不能完全令我们满意,或者说它尚有诸多需要改进、添补、转换和突破之处,需要一种全面而深刻的超越。学术研究是一个积累

与超越的过程;今天的研究能达到什么样的水准,取决于我们在过去研究的基础上能超越到怎样的程度。

对过去的研究方式提出反省,并不意味着认定过去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对马克思思想的阐释丝毫没有学术意味或专业成就;但同样需要指出的是,就20世纪而言,大多数论者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把它当作一种单纯的学术对象,而主要是将其视为一种诠释时代问题和解决现实矛盾的策略、手段来考虑的。我们可以在对马克思思想毁誉不一的、往往是极端对立的不同的评论者那里看到,解读马克思文本的相同的方式:解读者往往根据当时现实状况生发、概括出的观点,从既有的政治立场出发,到马克思的文本中去寻找论据和支持、阙失和差池,然后又借助这些论据和支持、阙失和差池,强化对自己观点和策略的信念;这种情形下,解读者不仅不可能以文本本身为本位,而且必然会肢解文本的完整性,过分突出那些与现实观点契合或相近、疏离或相违的部分和思想,而忽略文本中的其余部分,这时文本实际上已成为他论证自己观点的一种工具。这样,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必然充满了功利性考量。不只是在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存在这种情况,就是在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和学者那里亦是如此。比如,"西方马克思主义"和东欧"新马克思主义"对《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极端重视和突出强调,着眼点其实并不是这部著述本身,以及从中所体现的作为马克思一生思想演进历程中特定阶段的思考,而是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斯大林模式"的强烈不满。

针对上述情形,我认为,今天的马克思研究必须首先强调要回到文本。也就是说,要真实地把握马克思的思想,必须把他、他的文本作为一个客观的对象来进行探究,而不应当人为地回避、舍弃某一部分,或过分突出、张扬某些方面。我们应当遵循学术研究的一般原则和路径,尽量排除主观因素的左右和影响,来进行客观性研究和分析;我们只遵从逻辑和理性,而不趋同于所谓的"潮流"和"时尚",在对马克思文本的解释上不定于一尊,允许有多种观点和论断。

■ 填补研究空白 ■

尽管研究马克思的著述确实可以说是汗牛充栋,但可能只有专业研究者知道,事实上迄今为止也没有一部囊括马克思全部著述的全集出版,我们所熟悉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通行本俄文版50卷、中文版50卷、德文版41卷其实并不"全",这些版本的编辑原则很明确,它"是供广大读者阅读的,它并不是供学术研究的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部著作的完整的版本",特别是马克思辞世时留下的数千页亲笔手稿、笔记和书信,众多藏书中的眉批、评注等,还没有全部整理出版。早在20世纪20年代,苏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院长达·梁赞诺夫力图"按马克思的原始文稿刊出全部著作",以供专家、学者研究之用的"历史考证版"上马后,便命运多舛,第1版只出版了12卷13册就夭折了,第2版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着手编辑后,也历经坎坷,到现在为止只出版了50多卷,完成量不及计划的一半。马克思原始手稿相当部分没有面世,这意味着文本研究中尚存在不小的空白需要填补。

退一步说,即便是对于通行本,过去也把主要的精力放在那些成型的著述中,而对大量的笔记、札记、提纲、书信等研究得非常不够,或者有的仍是空白点。举例说,马克思的著述中,三分之二强是笔记,它们是马克思计划中写作的著作的准备稿、过

程稿和补充稿,要研究马克思的著作,离开对这些资料的分析,特别是正式稿与过程稿的比较,是不可能做到对马克思思想全面、准确而深刻的把握的。仅就笔者有限的了解,诸如1839年的7本“博士论文”笔记,1840年–1841年的8本“柏林笔记”、1841年的5本“波恩笔记”、1843年的5本“克罗茨纳赫笔记”,1843年–1845年的7本“巴黎笔记”,1844年–1845年的黑格尔现象学提纲、1845年的3册“布鲁塞尔笔记”,1845年的9本“曼彻斯特笔记”,1851年–1853年的24本“伦敦笔记”,马克思晚年的7册《编年摘录》和《印度史编年稿》等等,对国内学者来说,关于这些著述的研究都是非常薄弱甚至是没有涉足过的。比如,马克思文本中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共产党宣言》,我们过去关注的主要是它的思想和策略,但对它的创作过程、对它的四个部分的文体结构等的研究就非常不够,而离开由这些方面构成的当时的特定语境,孤立地阐发其思想,是极易造成误读和偏差的。再比如,《资本论》可以说是马克思毕生心血之所在,对它的研究国内学界下的功夫最大、取得的成就也较为显著,但我们的工作主要还是集中在成型的第一卷,而对该卷的不同版本,第二、三卷的正式版(即恩格斯整理过的)和手稿本(马克思),作为第四卷的《剩余价值理论》的正式版(即考茨基整理过的版本和前苏联文献专家整理过的版本)和手稿本(马克思)的比较,尤其是把透露马克思长达40余年艰辛创作历程的重要心迹的书信纳入《资本论》创作史的研究中等工作,我们基本没有触及,而这些是文本研究的内在要求。

由此可以知道,那种断言对马克思文本的研究已经过多、过时的论调,如果不是出于别有用心,就是一种极端无知。尚有如许空白需要去填补,我们的工作可以说任重而道远。

■ 客观把握思想 ■

通过重新阅读马克思的文本,把握其思想,重要的是要甄别属于马克思自己的问题、思路、论证方式和理论架构。

必须说明的是,重新研究马克思的文本也不是“为文本而文本”、“为研究而研究”,而是要通过对文本的悉心解读,客观地把握马克思本人的思想,接近其复杂的心灵世界。我们大概都有这样的看法,虽然马克思是20世纪人们谈论、研究最多的思想家之一,但关于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本人的思想相比发生了怎样的变化等问题,我们并没有梳理、甄别清楚。而在把握马克思本人思想的时候,所凭依的文本不同,勾勒出的形象会有极大的差别。比如,20世纪大多数论者仅仅依据由《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哥达纲领批判》等构成的文本系列来理解马克思,往往把他的思想诠释为理论实质上的“斗争哲学”、社会形态演进中的单线论和直线论、具体革命中你死我活的专政策略。而又有一些论者则依据由博士论文、《莱茵报》、《德法年鉴》、《新莱茵报》等报刊上的文章,《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类学笔记”等所构成的另一套文本系列,把马克思的思想理解为理论实质上的人道主义思潮、社会发展问题上相对主义和多元化选择论以及渐进式和平改造的策略。其实,这些著述都是由马克思本人在不同时期写作的,只有把它们全部纳入研究视野统摄起来考察,才能理解马克思思想的丰富内涵及其发展演进的曲折历程。

“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仅就理论研究而言真可以说是个荆棘丛生的领域,各种观点的论争相伴始终。澄清这

些理论纷争，回到马克思的原始文本是一条重要途径。仅就新中国六十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争论来看，诸如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社会制度和生产力关系问题、“思维和存在的统一性问题”、辩证法规律的问题、主观能动性和客观规律性问题、“一分为二”与“合二而一”问题、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生产力标准、哲学体系结构问题、哲学功能问题、哲学的基本问题等等，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旷日持久，除了具体的时代背景，论者多以思辨的方式立论，尽管也引用过经典作家的话语，但多数是离开这些话语所由产生的特定语境而进行的抽象引用，因而最终难作决断。而如果回到经典作家的原始文本，就会清楚地看出这些问题在他们那里是在什么意义上提出来的、有什么样的具体含义、在其整个理论框架中占据怎样的位置、他们的观点具有什么特殊意义和超越性质、时代的发展对其学说能做出怎样的检视和判断，等等。通过这些工作既可以使经典作家的真实思想及其意义得到澄明，同时也廓清了这些问题延展到当代的现实境遇和新的内涵。

还必须指出，通过重新阅读马克思的文本，把握其思想，重要的是要甄别属于马克思自己的问题、思路、论证方式和理论架构。对这些方面做出概述当然需要论者的抽象，但这种抽象必须是从文本中逻辑地推导出来的。在我看来，通过对马克思文本的解读，我们至少应当可以甄别清楚三个层次的问题：一是显性层次的，诸如马克思思想的资源背景，不同时期的过渡环节和重要变化，马克思恩格斯与黑格尔哲学、与青年黑格尔派、与共产主义者同盟等的关系等。二是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初级抽象，诸如马克思对世界历史、社会结构、社会形态演变、人的现实境况与未来命运等问题的具体看法和论述，对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所做的解释、批判和论证等。三是最高层次的概括，即马克思理解现代社会的角度、理解历史和重构“历史编纂学”的原则、观照和把握世界的方式等。如果在这些问题上我们能获得基于对文本的扎扎实实的研究和严格的逻辑推断的新见识，那么我们的马克思研究必然会达到一个新高度、新境地。

■ 公正评估价值 ■

面对复杂的社会历史，马克思提出劳动实践以及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等等概念，再现了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了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的原因……这是迄今为止历史观上最重要的变革之一。

对于马克思这样的思想家我们不需要为他做什么辩护，如果他思考的主题已经成为人人皆知的常识或者完全与时代背离，他提供的思维已无力诠释社会和历史，那他必然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在这种情况下，即便竭力为之辩护也不能挽救它衰落的命运；相反，如果他对世界大势的把握仍然契合当代社会的发展，他观照历史的方式仍然是最有效和科学的思维，那么他就具有不可超越的优势。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抱有意识形态成见，力图贬低其价值的做法，也只能是徒劳和虚妄。马克思思想已经经过了一百五十余年的深刻检视，时至今日，我们已经不必为尊者讳、为贤者讳，当然更不能为了迎合潮流和时尚而失却公正和理性的判断。

就马克思当年理论思考的视野看，他的思想产生的基地是西方发达国家，主要是英、德、法三国，我们可以看出他在言说这三个国家的历史、现状时，表现得是多么游刃有余、入木三分！但一越出这一界限，就显现出他对其他国度、别的领域的研究

并不都是行家里手，他关于美国所做的大量评论，在深度上显然已经打了折扣，而对于东方国家和古代社会，诚如他自己也已经意识到的，一直是他理论思考的盲点。尽管他晚年做过一些补救，但从留存下来的材料看，对俄国村社制度解体后的社会发展趋向，他做不出肯定的判断，他编定的《印度史编年稿》，由于材料的缺乏，不仅失之简单，而且有重要的遗漏和谬失。对于中国这个东方大国，他也写过评论，但除了对八国联军火烧圆明园、英国人贩卖鸦片，表示基于人道主义的谴责，他没有提出更多的真知灼见，中国对他来说，的确是太神秘了。马克思对自己的学说，如果向前延展到古代是否还具有普适性也心存疑虑，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出版后，他如获至宝，做了大量摘录，但仅凭这部书要勾勒出古代社会的图景及其发展是太不够了。马克思生前不知道克里特文明、迈锡尼文明、埃特鲁里亚文明，除了迦太基而外，欧洲海上文明也不甚了解；而撇开这些阶段对古代社会的发展线索能有什么真正的把握呢？马克思在当时的情形下对一些问题的判断、处理也是值得商榷的，比如，他敲响了资本主义灭亡的警钟，但没有预见到资本主义可以通过自我调整和改革延长了寿命；他确信社会主义只有在西方发达国家，同时进行革命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成功，没有预见到全球各地区、各民族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会导致世界无产阶级革命道路和进程的多样化、曲折性和复杂性；在社会有机体结构系统中，他突出强调了经济因素和政治功能，而对于文化的作用的估量明显不足，对宗教的意义的理解并不全面，更没有预见到现代科技进步会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首要因素，等等。

当然，尽管存在盲点、错误，但是从总体上看，马克思学说更具有不可超越性的当代价值。在我看来，主要是马克思从实践的角度观照和把握世界的方式，仍占据着当代思维的制高点。在方法论的意义上，马克思主义哲学既是实践的，也是辩证的和唯物的；或者确切地说，是实践基础上辩证法和唯物论的统一。实践不是凝固的点，不是僵化的实体，而是一种关系、一种过程、一种活动，实践是人类世界或现存世界存在的根据和基础；同时人又通过自己的实践活动，使世界成为一个更大规模、更多层次的开放体系。因此，实践的思维方式就必然要求人们以联系的观点、运动的观点、发展的观点去认识事物、把握世界，而这正是实践论的辩证方法；因为“辩证法在考察事物及其观念上的反映时，本质上是从它们的联系、它们的联结、它们的运动、它们的产生和消失方面去考察的”。同时，实践的思维方式也必然是唯物的，它突出强调的是，研究任何问题都必须从事实出发，而不能把原则作为出发点，“不论在自然科学或历史科学的领域中，都必须从既有的事实出发”，“原则不是研究的出发点，而是它的最终结果；这些原则不是被应用于自然界和人类历史，而是从他们中抽象出来；不是自然界和人类去适应原则，而是原则只有在适合于自然界和历史的情况下才是正确的”。

特别是在对社会历史领域的复杂现象进行诠释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实践论基础上的唯物论与辩证法相统一的哲学方法发挥了其他哲学派别无可比拟的有效性。人类社会是由许许多多按照自己的主观意愿行事的人所构成的，它的发展规律和趋势深藏在无数意见、计划、情绪、意志、愿望之中或之后，摆在人们目前的迫切任务是游过这些意见、计划等构成的汪洋大海而达到彼岸。面对复杂的社会历史，马克思提出劳动实践以及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

社会存在、社会意识以及社会革命等概念，真实地从理论上再现了各种社会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揭示了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的原因、途径、趋向，使得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显现出井然的秩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观上最重要的变革之一。

■ 制约与界域 ■

马克思学说的要旨在于关注时代、关注实践，保持对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及其趋向的敏感和热忱，时刻倾听实践的呼声。学术研究有自己的独立性，但它的基础与归宿是社会。只有把二者联系起来，才能体现马克思思想的根本价值。

以上只是根据我自己的理解，对重新研究马克思文本的意旨做了简略的阐释。当然，研究者必须对自己的研究工作有一个恰如其分的估量，明确其界域和难度。而对于马克思文本研究而言，关乎这一方面，我想特别指出两点：

第一，仅就力图透视马克思复杂的心灵世界、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实质而言，马克思的文本是我们研究的重要依据，但不是唯一的依据；或者说，文本诚然是非常重要的，但仅有文本还是不完备的。一方面，要还原马克思当年思考的特定语境，我们不能仅从马克思本人的文本出发，而必须尽可能寻找同时代其他论者的著述和文献，通过对比把握马克思思想的渊源、思路、构架及其在当时的影响和地位。比如，离开整个青年黑格尔运动和德国宗教改革的背景，不可能理解青年马克思的变化，不了解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而单纯研究《德意志意识形态》、不知道“魏特林纲领”而只探讨《共产党宣言》，等等，都不可能真正了解马克思思想的独特性。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相对于马克思极为复杂的思想、异常丰富的心灵来说，文本所表征的可能只是露出水面的巨大冰山的一角。虽然在马克思的一生中理论著述是其极为重要工作，伴随了他绝大部分时间，但文本与其思想、心理之间，文本与解读者之间并不总是存在一一对应的关系，不是什么心理嬗变都可梳理成明确的思想、什么思想都会形诸笔墨、什么文本都会被解读者完整地理解的。对于我们这些解读者来说，要从白纸黑字的表层结构读出蕴涵其中的深层意义，又要于无“字”处诠释坎坷的人生，殊为易事。

第二，在更大范围说，文本研究虽然是马克思研究的永恒性基础，但不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全部内容。首先，马克思主义创立至今的150余年，它所参与建构和直接影响的世界真正是沧海桑田、波澜壮阔，较之马克思在世时的情形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清理“马克思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发展路径，辨析理论和实践中的具体变迁，是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我们立足于马克思的原始文本研究，同时应有更为展宽的视野、丰富的内容以及融会历史与现实为一体的深刻分析。其次，马克思学说的要旨在于关注时代、关注实践，保持对社会发展重大问题及其趋向的敏感和热忱，时刻倾听实践的呼声。学术研究有自己的独立性，但它的基础与归宿是社会。只有把二者联系起来，才能体现马克思思想的根本价值。最后，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发展着的学说，弄清楚它的原始状态和思想实质，当然是重要的；但它不应当也不会永远停留和保持在19世纪的水准和形态，在经过20世纪的实际发展和深刻变革之后，在继承并超越的基础上必然建构起21世纪的新形态，而这是更为繁难的工作。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博导）

——摘自《光明日报》

学习贵在“博”“通”“悟”

韩长赋

在建设学习型政党的大背景下，重视学习、加强学习已成为广大党员干部的共识。学习本身也是一门学问，需要把握规律、讲究方法。一般来说，搞好学习、增长才干，需要把握三个关键词：一是“博”，即博学多才、学富五车；二是“通”，即由此及彼、融会贯通；三是“悟”，即发现规律、运用规律。

人们学习某一专业，或者长期从事某一项工作，往往能够从容应对业务上的事情乃至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但领导干部除了要熟悉业务，还要带班子、带队伍，从事管理、沟通、协调等多方面的工作。这就需要渊博的知识、多方面的才学。因此，仅仅“专”远远不够，还需要在“博”上下功夫。那么，如何做到“博”呢？首先需要勤奋学习、刻苦钻研，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并长期地坚持，即做到“活到老，学到老”。就学习内容来说，不但应学习岗位所需的专业知识，还应广泛学习历史、哲学、科技、管理、自然、地理等方面的知识，特别应在历史、地理等方面花点功夫。因为不管干什么工作，都需要了解和掌握这两门知识。正所谓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秀才不出门，便知天下事；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就学习方式来说，不但应向书本学习，还应向群众学习、向实践学习，加强调查研究，了解方方面面的知识，不浪费每一个学习增知的机会。

有的同志虽然学的知识很多，在一个岗位上干得也不错，但一旦换一个岗位、进入一个新的领域，就无所适从、难以适应了。还有的同志在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行业工作了一辈子，但对这个地区、这个部门、这个行业的实际情况、发展思路、发展方向等仍说不太清楚。出现这种情况，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对所学的知识没有做到融会贯通。“打通”所学的各种知识，需要把学习和思考结合起来，脑子里经常装几个问题，对新知识、新事物抱有浓厚兴趣，用心用力、思索钻研，努力想明白、想通透，而不能浅尝辄止、一知半解。同时要善于总结，把零散的东西归纳成系统的知识，把感性的认识上升为理性的思考。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的，聪明的人，一是善于学习，二是善于总结。此外，还要善于借鉴、联想：善于与人交流讨论，乐于学习他人的经验和成果，从中得到启迪；善于找到事物之间、工作之间的内在联系，从

而集合各类知识、调动各方面资源来说明问题、解决矛盾、推动工作。

如果说“通”是由此及彼,“悟”就是从无到有,是学习的更高境界。悟性高的人,善于从纷繁复杂的事物中理出头绪、找到方向,善于把个别的、具体的事物概括成抽象的结论和普遍的规律。简言之,“悟”就是发现规律和运用规律的活动。“悟”的基础是“博”和“通”,没有“博”和“通”就难以实现“悟”。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讲道:“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境界也。”他所说的第三种境界,应该就是对规律的突然领悟,是学习上的“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悟”需要艰辛的探索、漫长的积累,也需要一点聪明和睿智。正如华罗庚讲,一分天才加九分努力。“悟”是百思不解、辗转反侧,是厚积薄发、十年破壁,是捅破一层窗户纸,“悟”出来是一种大快乐。

需要指出的是,无论做到“博”还是达到“通”、“悟”,都需要踏实的功夫,能静下心来,坐得住冷板凳。古人讲:道生于静。实践也证明,优秀的领导人才大多是那些坐得最长、睡得最少的人。当下多浮躁之风,更应力行静心读书、静心思考,力戒心浮气躁、急功近利。

——摘自《人民日报》

【本栏责任编辑】王军

历史小贴士

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新进中央委员共211人 最年轻的是时任甘肃省建委副主任胡锦涛

1982年9月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共选出348位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其中新选进中央委员会的有211人,年龄在60岁以下的有171人。这就从组织上实现了中央领导集体的新老合作和交替。

9月13日,十二大闭幕后的第二天,下午四时半,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举行了一个特别的仪式。邓小平、陈云等中央领导同志同出席十二大的全体代表合影留念后来到这里,专门接见39位新当选的年轻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这些年轻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依次步入大厅,中央组织部的同志一一唱名,向邓小平等介绍他们的情况。

第一个被介绍的,是52岁的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李淑铮,她是新选出的候补中央委员。这39位同志中,还有新当选为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46岁的郝建秀,53岁的民政部部长崔乃夫,53岁的水利电力部第一副部长李鹏,47岁的天津市委书记李瑞环,52岁的福建省委书记胡平,50岁的航天工业部副部长宋健,52岁的机械工业部副部长何光远,52岁的上海交通大学副校长张寿,51岁的空军某军军长于振武。最年轻的是甘肃省建委副主任胡锦涛,他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当时只有39岁。另一位年轻的同志是42岁的李慧芬,她也是清华大学的毕业生,当时任天津无线电联合公司第一副经理兼总工程师。

——摘自《中国1978—2008》

毛泽东对辛亥革命的评价

卢　毅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时，毛泽东18岁，正就读于湘乡驻省中学。10月下旬，湖南起而响应武昌首义，积极拥护革命的毛泽东随之参加湖南新军。他后来曾回忆："我本人也曾经参加了这次民主革命，当了一名战士，吃七块二。"后来，"南京政府解散了。我以为革命已经结束，便退出军队，决定回到我的书本子上去。我一共当了半年兵。"此后，毛泽东对早年亲历的这场革命作过多次评价。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中，毛泽东是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论述得最早，内容也最全面和最深刻的。

一

1919年七八月间，刚刚经历五四运动洗礼的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发表《民众的大联合》一文，其中写道："辛亥革命，似乎是一种民众的联合，其实不然。幸(辛)亥革命，乃留学生的发踪指示，哥老会的摇旗唤呐，新军和巡防营一些丘八的张弩拔剑所造成的，与我们民众的大多数，毫没关系。我们虽赞成他们的主义，却不曾活动。他们也用不着我们活动。然而我们却有一层觉悟，知道圣文神武的皇帝，也是可以倒去的。大逆不道的民主，也是可以建设的。我们有话要说，有事要做，是无论何时可以说可以做的。"这是目前所见的毛泽东对辛亥革命的最早评价。

到大革命时期，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的毛泽东为了与国民党右派辩论，于1926年1月发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对辛亥革命的失败原因作了更为深入的剖析。他认为："辛亥年的革命，虽然其本质应该是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然因当时多数党员还没有看清此点……革命的口号变成简单的'排满'，党的组织和内容是极其简单，作战的队伍是极其孤弱。这是因为当时还没有有组织的工农群众；当时国内还没有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国际的局面是几个强国霸占了全世界……只有资产阶级的国家，没有无产阶级的国家，因此中国当时的革命没有国际的援助。"

随着国民革命的风起云涌和对农民运动的加深了解，毛泽东对辛亥革命的缺陷有了更清晰的认识。1926年夏，他在其主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总结中国农民斗争的历史，特别是辛亥革命以来的历史经验，指出在此之前，中国革命党人都没有注意研究农民问题，辛亥革命、五卅运动之所以失败，在于"完全未得三万万二千万之农民来帮助和拥护"。不久，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又强调指出："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

大革命失败后，出于对国民党背叛革命的刻骨仇恨，中国共产党一度认为"三民主义完全是一部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理论"，必须揭露"孙文主义思想的反动性质"。在此期间，毛泽东也很少提及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对此，他后来曾经解释说："这是反映了内战

时期的情绪,那时候,因为环境不同,连孙中山也不要了……”

二

抗战时期,随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毛泽东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论说逐渐增多,评价也日趋增高。1938 年 3 月 12 日,他在纪念孙中山逝世 13 周年的讲话中就提纲挈领地指出:“孙先生的伟大在什么地方呢?在于他的三民主义的纲领,统一战线的政策,艰苦奋斗的精神。”接着又评价说:“孙先生的三民主义纲领与统一战线政策,实为处在半殖民地国家的大革命家对于中华民族最伟大的贡献。不但如此,孙先生的伟大,还在于他的艰苦奋斗、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革命毅力与革命精神,没有这种毅力,没有这种精神,他的主义与政策是不能实现的。”所有这些,都“表现了孙先生的伟大革命家模范”,“是孙先生留给我们的最中心最本质最伟大的遗产”。

到 1945 年七大前后,毛泽东更是充分赞扬了孙中山的贡献。在《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报告中,论述孙中山便有 27 处,其中 6 处直接引用了孙中山的有关观点,这一举动可谓不同寻常。他还解释说:“对孙中山讲得是否太多了?不多。我们要善于引用他,这没有害处,只有好处……对党内一些人存在不尊重孙中山的情绪,应该说服。”在七大的口头政治报告中,毛泽东也说:“第二个问题,关于孙中山。在我的报告里很说了几句好话。孙中山这位先生,要把他讲完全。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是讲历史辩证法的。孙中山的确做过些好事,说过些好话,我在报告里尽量把这些好东西抓出来了。这是我们应该抓住死也不放的,就是我们死了,还要交给我们的儿子、孙子……将来我们的力量越大,我们就越要孙中山,就越有好处,没有坏处。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这些对孙中山的褒奖之词,几乎达到了一个空前的高度。

抗战期间,毛泽东对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也多有论述。1937 年 8 月,他在《矛盾论》中便写道:“统治中国将近三百年的清朝帝国,曾在辛亥革命时期被打倒,而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同盟会,则曾经一度取得了胜利。”1939 年 5 月 4 日,他在《青年运动的方向》讲演中也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从先生开始的革命,五十年来,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这种认为辛亥革命既成功又失败的观点,在中共党内应是毛泽东比较早地提出来的。

1942 年 3 月,毛泽东在《如何研究中共党史》的讲话中再次重申了上述观点:“我们写历史时常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其实并不能说完全失败,辛亥革命有它的胜利,它打倒了直接依赖帝国主义的清朝皇帝。但后来失败了,没有巩固它的胜利,封建势力代替了革命,袁世凯代替了孙中山。”在这个讲话中,他还指出:“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还应该把党成立以前的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材料研究一下,不然,就不能明了历史的发展”,“所以严格地讲,我们研究党史,只从 1921 年起还不能完全说明问题,恐怕要有前面这部分的材料说明共产党的前身”,“从辛亥革命说起差不多”,“孙中山的几个重要宣言等,都要研究”。言辞中对辛亥革命历史意义的表彰十分明显。

此后,国共合作虽然再度破裂,但毛泽东对辛亥革命评价仍然较高,而且还迭出新意。1947 年 2 月,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说:“革命高潮快要到来。这种高潮在近半个世纪的

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第一次就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北伐战争,第三次是抗日战争,这三次都是全国规模的。其他如五四运动、五卅运动、土地革命战争等规模都不够,土地革命战争也没有发展到全国范围。”这种将辛亥革命的影响力列在五四运动乃至土地革命战争之上的提法,可谓是相当高的评价。1949 年 9 月 16 日,毛泽东在《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指出:“辛亥革命是革帝国主义的命。中国人所以要革清朝的命,是因为清朝是帝国主义的走狗。”这个说法也一改过去对辛亥革命反帝不足的批评,充分肯定了其反帝性质。9 月 21 日,他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的开幕词中又说:“一百多年以来,我们的先人以不屈不挠的斗争反对内外压迫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其中包括伟大的中国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辛亥革命在内。我们的先人指示我们,叫我们完成他们的遗志。我们现在是这样做了。”这更是明确告诉世人,即将建立的新中国政权是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

三

新中国成立后,伴随着政权的逐步稳固,毛泽东对孙中山和辛亥革命的评价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1954 年 9 月,他在审阅刘少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的报告》时,对涉及辛亥革命的部分作了修改,使之最终形成文字为:“辛亥革命使民主共和国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使人们公认,任何违反这个观念的言论和行动都是非法的。但是当时的革命派是有缺点的。他们没有一个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纲领,没有广泛地发动和组织可以依靠的人民大众的力量,因此他们不能取得对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彻底胜利。这次革命终于失败了”。显然,这段文字的侧重点是指出辛亥革命的失败。

后来在讨论宪法草案的过程中,有些民主人士认为将辛亥革命定性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不妥,“在感情上有些过不去”。为了平息这些争议,毛泽东还专门作了一个《关于辛亥革命的评价》的讲话,明确指出:“从社会发展历史上说,辛亥革命确实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民主革命。”他还分析说:一方面,“孙中山比改良派又更进一大步,他公开号召实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翻了清朝的统治,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中华民国和临时革命政府,并制定了一个《临时约法》。辛亥革命以后,谁要再想做皇帝,就做不成了。所以我们说它有伟大的历史意义。”但另一方面,“辛亥革命没有成功,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就是因为孙中山的领导集团犯了错误,有缺点。关于这一点,孙中山有过自我批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上曾经说,当时向袁世凯妥协是不对的。国民党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都做了批评,现在我们就不能批评吗?”这里,毛泽东虽然肯定了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但并未说其成功,而是明确说“辛亥革命没有成功,失败了”。

1956 年,由于和平解放台湾政策的提出,情况又有了新变化。1956 年 11 月是孙中山诞辰 90 周年,毛泽东特意撰写《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号召大家“纪念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以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至于其缺点,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显而易见,毛泽东此时对辛亥革命的评价,不仅不再言其失败,而且重申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摘自《百年潮》

【本栏责任编辑】杨欢

赵匡胤抓舞弊轶事

宗承灏

考场舞弊事件不过是赵匡胤借题发挥的由头，他的真实意图很明确，就是要把官员的选拔权抓到自己的手里，借此削弱文人官僚的权力。

开宝六年(973年)的一天，宋太祖赵匡胤在朝堂之上按照惯例会见当年新考上的进士。新录取的进士有十一人，诸科二十八人。这些未来官场的后备干部们来到皇帝日常主持重要会议和政务活动的讲武殿，接受国家最高权力者的接见。

在简单的试探之下，赵匡胤居然从中间揪出了两个滥竽充数的人，认为他们在这些人中间“材质最陋”，水平最稀疏。这两个人，一个是进士武济川，一个是三传刘浚。

在此之前，像这样的接见与谢恩活动都是程序化，与科举考试本身并无本质上的联系，甚至连面试都算不上。但是这次与以往不同，赵匡胤好像格外地重视，他将吏部的铨选职责也揽在自己的身上。吏部从那些通过科考的考生中铨选官员，类似于今天的组织部门找当事人谈话，要通过简短的谈话过程，来考察考生的“身”、“言”两大入仕指标。这样的考察形式本来就是不靠谱的，就算“言”可以通过说话者的谈吐对其个人水平有个大致了解，但是“身”则成了一档选秀节目，就是用外表去衡量一个人是否具备做官的才华，完全成了以貌取人。

就是这两个简短的程序让武济川、刘浚露出了马脚，他们在回答赵匡胤的问话时，答非所问，完全跑题。这让赵匡胤非常愤怒，难道我堂堂帝国选拔来选拔去，就选出这样的人才？他当朝就撤去二人功名，退回原籍。打发完两人，赵匡胤开始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这场科考的主考官是翰林学士李昉，李昉刚刚重返赵宋帝国权力中心并成功地掌握了干部选拔权。按照以往的历史经验，随着这些高中的考生们陆续进入官场后，昔日的考生就成了自己的“门生”，也将是他权力世界的宝贵财富。那样的话，李昉的政治地位将会得到大幅度地提升。

就在李昉对未来无限憧憬的时候，赵匡

胤居然在一场简单的殿试中发现了问题。

在随后的调查中,赵匡胤了解到被他除名的考生武济川与李昉有同乡关系。赵匡胤的愤怒可想而知，主考官李昉难以洗脱罪名。

在这次事件后，赵匡胤作出两项决定,一是重新考试;二是赵匡胤经过调查,确认原来的主考官李昉在主持考试过程中的确存在不公,于是就抹掉了李昉翰林学士的头衔,并让他背了一个降职处分。

有意思的是赵匡胤重新组织的那场考试,除了之前已经除名的武济川,李昉所录取的其他十个进士再次被录取。让人感到不解的是,从第一名到第十名,连顺序排名都原封不动。除了这十人又补录了二十六名进士,“不过附名在此十人之后”。这样看来,考场舞弊事件不过是赵匡胤借题发挥的由头,他的真实意图很明确,就是要把官员的选拔权抓到自己的手里,借此削弱文人官僚的权力,来强化自己手中的皇权。而李昉不过是这场弈局中的一个棋子罢了。

赵匡胤最担心的是,像李昉这样的在朝大臣之间或大臣和一般士大夫之间抱团的派系（朋党），成为中央集团的一股分割力量。

这场似有若无的“科场舞弊事件”最大的得益者是宋太祖赵匡胤,他借着这样一个事件，为科举考试增加了一道新的考试程序,那就是让士子与皇帝面对面地殿试。这样一来,皇帝就把对文官的选拔权牢牢地攥在了自己的手中。

（作者系历史畅销书作家）

——摘自《人民论坛》

（上接第 41 页）调、不可持续等问题依然突出,各种社会矛盾不断凸显。由于收入差距过大,两极分化明显,加之腐败现象屡禁不止,易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利用,稍有不慎,就会引起突发事件。今年春,江苏响水县谣言(化工厂爆炸)致逃难者翻车死亡事故,就是典型的说明。因此,社区管理者必须坚持“两手抓”，一手在物质上让社区居民得实惠，如为广大居民提供舒适的居住环境、惬意的休闲场所、便捷的生活服务、良好的教育环境等;另一手要在精神上让社区居民充实提高,如建立社区管理公示制度,使社区的重大活动都在阳光下运行,发挥社区居民的主观能动性,激发他们参与社区建设的积极性,积极开办健康有益的科学讲座和高尚的文化体育活动,办好黑板报和橱窗画廊展览等，提起居民的知识修养和整体素质,以便自觉为维护社区和谐作出努力。

增强企业和新经济组织的社会责任感。创新社区社会管理不单是政府部门的事,也是人民群众和各级社会组织的份内事。社区建设的重点在于完善社区管理机制,健全社区管理体系。显然,除了要发挥社区党组织、社区居委会的作用外,还要努力发挥社区社会组织的作用,增强企业和新经济组织的社会责任感。对一个社区来说,企业尤其是大型和知名企业,可以起到风向标的作用。这些企业的员工既是企业人，也是社区人,他们的言行对社区的群众能产生直接的影响,企业的稳定和员工有良好的精神风貌,企业和社区联合共建等,都会为社区的和谐建设带来活力。同理,新经济组织也有同样的作用。因此,必须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组织服务管理,动员社会组织参与社区建设,通过遵循共同社会规范特别是倡导诚信文化,建立相互信任的社会网络，促进相互合作,增强社会责任,从而进一步提高社区的社会管理水平。

（作者单位:淮安市民政局）

国外如何考核官员

王方　储黎　张雷　李叶明

把企业管理理念引入到政府的内部管理中，是西方国家“政绩考核”的一大特色。不过，由于制度设计的不同，各国对评估官员政绩的理解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而具体的考核指标亦有不同。

高官与一般官员不同

在日本，“论资排辈”是选拔官员最看重的指标之一。一位谙熟日本政坛规则的记者直言：“自己多年来从未听说过‘官员政绩考核’一词。”他告诉记者，“高官”多由选民的选票说话，对他们而言，选票多寡既是政绩考核的最佳证据。而当上级选拔下属时，除资历外，家庭出身、人际关系也都是重要的考量因素。

这一点在西方官员任用中颇为普遍。不过，具体的公务员绩效评估制度则严肃得多。

以美国为例，考核指标体系往往强调客观公正，非以评估者主观意愿随意确定。在评估个人绩效时，更注重部门的整体任务完成情况。在考核中，以往评估中优劣顺序的记载、与工作表现无关的身体特点和个人性格、请假记录、与工作表现无关的生活问题等不适当的内容必须剔除。

美国各部门在做出培训、奖励、提升、留用、重新委派工作、开除等人事决定时，必须以评估结果为依据。只有在给予公务员以合理的时间和机会改进工作表现以后，方可免职或降职。其中的评价体系还包括一些具有创新和实际衡量意义的指标，如判断力、首创精神、放权、人员配置等，这也是美国官员政绩考核的特色之处。

“住房难”令部长下马

大多数情况下，一般官员只需尽心尽力做好本职工作，展现应有的专业与操守，就不会有人来“砸饭碗”，这就是所谓的“打政府工”。

由此，承担政治风险的往往是大选中获胜的总统、赢得组阁权的政党所任命的总理、部长等高官。对他们的考评方式中，一个基本原则是需要承担“政治责任”，也就是对政策的一切后果负责。

例如新加坡的申购政府组屋政策。在亚洲金融危机后，新加坡曾一度出现大量组屋空置多年卖不出去的情况，令建屋局蒙受不少损失。因此政府推出“预购组屋”政策——

先开放将要发展的组屋项目供大家预购，在超过七成被预订的情况下才真正开始招标兴建。这就杜绝了政府组屋出现“供大于求”的可能。

然而这几年，随着新加坡房地产价格大涨，政府组屋也受到波及。很多第一次申购政府组屋者，尤其是等房结婚的年轻夫妇们，总是迟迟无法申请到心仪的组屋；即便好不容易申请到，也还需要等上几年才能拿到房子。这是由于政府目前采用的是一套“预购组屋”的政策。

不能满足现实需求的“预购组屋”政策惹来了民众的强烈不满，令负责建屋局的国家发展部部长马宝山民望大跌，以至于大选后未获入阁，丢掉了他担任多年的部长职务。

事后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坦承组屋价格上涨过快令他付出“政治代价”。显而易见，这里的“政治”核心是以民意为归依，为大多数新加坡人谋福利，而不是单纯追求部门绩效或某些经济指标上的进步。

招商引资比不上环境保护

类似的教训在德国亦有发生：某一小城市市长一心想为城市招商引资，扩大就业率，提高自己的政绩。他大肆招投标，开发房地产和酒店业，侵占了原来位于城市中心的一片森林，遭到了市民的强烈反对。但该市长一意孤行，将自己的执政思路执行到底。虽然该城市的经济状况好转，就业率稳步提高，但市民还是不认可该市长及其班子的执政思路，在下一次的选举中直接用选票让其下课。

其实在德国，根据《公务员考核及晋升条例》规定，各级政府在每年年底要对公务员进行评估，由被评估者的直接管理者负责撰写评估报告。

每年一次的考核报告分为 4 个级别：杰出、高效、有效、不佳。政绩考核后，根据评定的档次，有关部门会选送一些成绩好的人参加培训。而评估成绩最差的公务员也得在限定时间内掌握必备的知识和技能，为继续留在原岗位创造条件。

但根据德国政绩考核条例的规定，地方官员的主管机关——联邦人事委员会只负责协调、联系和指导工作，具体管理则由各部门自己负责。在这样的背景下，忽略民意也只会“好心”办“错事”。

软硬兼施破除“铁饭碗”

有的国家由于侧重竞争和激励机制，已在强调打破一般官员“打政府工”的“铁饭碗”思想，其中尤以韩国最明显。

韩国政府绩效评估制度从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逐步发展并确立，包括政府业务评价制度、政府职务成果契约制度、政府责任运营机关制度和政府成果管理制度等，其中最主要的是政府业务评价制度。

早在 1962 年，韩国就引入陆军基本运营计划制度，政府设下各个部门建立以预算为前提的基本运营计划，并由国务总理室负责最终的审查和分析。2001 年 5 月，《有关政府业务等评价的基本法》正式颁布，将原先的审查分析制度发展成为了综合管理全体政府部门的业务评价制度。2006 年 4 月，韩国又颁布了《政府业务评价基本法》，该法综合了之前的各种评价体系，由国务调整室政策评价委员会统筹监督和实施。

在具体的公务员办公评价标准中，五级以下公务员业绩评价项目包括 70 分的公务业绩评价和 30 分的职务执行能力评价；五级以上公务员则增加一条公务态度评价标准。而这一系列的评价分数则直接和公务员的晋升机会连接起来，占到升职评价构成的 80%（另外 20%来自于资历评定分和其他加分）。在“硬指标”和“软指标”（下转第 64 页）

新加坡怎样选用党政人才

吕元礼

长期执掌新加坡政权的人民行动党奉行人才主义，主张精英治国。该党选用人才的方式富有特色，值得借鉴。

邀请人才很主动

为了物色最好的人才竞取议席、组成内阁，行动党不是仅从党内基层组织中的积极分子中选拔合适人选，而是通过主动游说、专门邀请各界优秀人才入党从政。

新加坡前行动党议员吴俊刚就是因“党找人才”而加入政坛的。吴俊刚本来是新加坡《南洋商报》的政治记者，1984 年正值大选来临之际，他的本职工作是负责采访介绍新的候选人。但是，有一天他却接到了时任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吴作栋的私人秘书的电话，邀请他到国防部去喝茶。吴俊刚描述了喝茶的情形：“吴作栋部长开门见山，道出用意：邀请你出来参加竞选。突如其来的邀请，我的自然反应就是说不，因为自觉性格比较内向，比较喜欢学术，不是从政的料子。这时，部长开始晓以大义，并且还举出诸多先例佐证。但我最终还是拒绝了他。这之后，他又约谈一次，仍以失败告终。然后，又有熟人打电话来继续游说，要我重新考虑，为民服务。终于，又去了一趟国防部。但吴作栋申明，这只是第一关，接下去，还得由中央执委会面试。主持面试的人都是中央执委会成员，记得当时在场的包括李光耀、拉惹勒南、巴克等人。他们连珠炮式地提出各种时事课题，要听你的意见，要知道你有什么解决方案。这一关过了，还要去大巴窑医院作身体检查。体检过关，方才尘埃落定。”

遴选程序很复杂

美国太空船阿波罗 13 号在离地球将近 32 万 8 千公里外的太空发生故障时，三名宇航员始终保持冷静和镇定，临危不乱，最后终于取得成功。这件事让李光耀相信，美国人一定有一套在减压室中考验人的办法。例如，在幽闭室中模拟真的危机，挑起恐惧，然后把那些惊慌失措的人剔除。从这件事情获得启发，李光耀邀请了心理学家和精神病学家为行动党候选人进行类似的测验，以帮助淘汰一些不适当人选。

从 1979 年开始，行动党采取了一种更为严格、系统的遴选候选人的方式。所有政治人才候选人必须经过多道筛选程序，其过关斩将的过程大致如下。第一道程序，候选

人被邀请与行动党第一组织秘书饮茶,进行一次正式交谈。第二道程序,候选人接受行动党秘书长第一助理领导的另一个委员会举行的进一步面试。第三道程序,通过考察的候选人,与由数位行动党部长级高官为核心成员的又一个委员会进行对话。第四道程序,是召集全体候选人召开对话会,晓以利害,由其自主决定是否继续接受选拔。第五道程序,同意担任行动党议员候选人的人士与党的职业活动家、内阁部长领导的专门选拔小组进行对话。第六道程序,在一天半的时间里,由心理学家和精神病专家对候选人进行强化考试。其目的是确认他们之中谁担任国家部长或更高的职务更合适。在这一天半的时间里,候选人要回答 1052 个问题。这包括笔试、对一些理论问题的考核和面试、对一些实际问题的考核。其中还有两次深入的辩论会。第七道程序,是与总理等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组成的第二个选拔小组见面。

健康人格很重要

行动党挑选政治人才时,重点关注如下四项指标:一是已受肯定的履历和能力。包括候选人的学业成绩、学术与职业表现、工作经验以及其他的成就;二是性格。候选人是否诚实、能很好地和人相处以及行为正当等;三是献身精神。他必须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我不只是该为自己的家庭和职业作出努力",也必须具有责任感,并了解"新加坡为什么值得珍惜以及为什么我必须努力维护和加强这个制度";四是政治潜能。候选人要能了解公众为何作出某种反应,要能和公众沟通,影响、说服和推动他们,同时掌握促使不同阶层人士一起工作的方法。

一些人选可能需要接受心理学家的测试,以证实他性格上的一些细节,例如,他是属于内向还是外向性格,他如何与别人相处,以及如何应对压力等。行动党也会在对这些人进行面试时了解他们父母的职业,他们是否有在生活上帮助自己的亲属以及是否和亲属保持密切联系等。这些人无须具有毫无瑕疵的家庭背景,不过,他们必须能为自己的一些过去作出辩护。以吴作栋在 1976 年获选为行动党候选人的面试为例,当时,担任总理的李光耀曾向吴作栋提出过这样两个问题:谁是你的朋友?你有什么抱负?李光耀提出上述问题的目的就是要了解候选人的行为动机和性格特征。他曾指出,在能力和性格两者之中,他比较重视的是一个人的性格。所以,当他面试候选人时,都会通过许多探索性的问题来摸清各个候选人的性格特征。

(作者系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摘自《资治文摘》

【本栏责任编辑】杨欢

(上接第 62 页)的双重作用下,对得分低的公务员,韩国政府会对他们集中教育和培训,如果业绩评价得分在返回岗位后仍然得不到改善,政府就将毫不留情地辞退他们。京畿道人事部负责人表示,虽然这种针对无能公务员的退出制度还有很多不足之处,但是政府会以"没有铁饭碗"为宗旨,在今后持续地加强和改善这一制度。

最近,韩国国家情报院也积极加强对政府职员进行办公评价,时间由一年一次改为一年两次。在今年 5 月份进行的五级公务员评价中,为了能够确保公正性和客观性,韩国西归浦市决定将内部评价和外部评价结合起来,由市民和相关专家组成八人业绩管理所委员会,分别从代表性、具体性、测定可能性、合理性等五个方面对公务员进行评价。

——摘自《国际先驱导报》